



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
雾月十八日



223
A45-4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 克 思

路易·波拿巴的
雾月十八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KARL MARX
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本书正文及书末注释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中的译文排印的，前面两篇序言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1卷中的译文排印的。

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旧译“拿破仑第三政变记”)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 印张 4 · 字数 87,000

1962年8月第1版
196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60,001—11,300 定价（五）0.40元
统一书号 1001·542

卡·馬克思为本书 第二版作的序言

我的不幸早逝的朋友魏德迈^①，曾打算从1852年1月1日起在紐約出版一个政治周刊。他曾請求我給这个杂志写一篇政变史。根据这个請求，我一直到2月中旬止，每周都为他撰写論文，总标题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时，魏德迈原来的計劃遭受了失敗。但他在1852年春季已开始出版命名为“革命”杂志的月刊了，月刊第1期的內容就是我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著作有数百份那时已深入德国境內，不过沒有在真正的书籍市場上出售过。当我向一个自命极端急进的德国书商建議銷售我这本书的时候，他的答复是对这种“不合时宜的企图”表示真正道义的惊愕。

从上述事实中就可看出，本书是根据对于事件的直接观感写成的，其中所研究的历史材料只是截至1852年2月止。現在把它再版发行，一方面是由于书籍市場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国的友人們的坚持。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現并且是专論同一問題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雨果著的“小拿破侖”和蒲魯东著的

^① 魏德迈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担任过圣路易区军事长官职务。（这是馬克思加的附注）

“政变”。

雨果只是对政变事件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辛辣的和诙谐的詈罵。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竟繪成了晴天的霹靂。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沒有觉察到，当他說这个人表現过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輕蔑而是抬举了这个人哩。蒲魯东呢，他想要把政变描述成为先前历史发展的結果；但是，他对于这个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說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于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了。这样，他就陷入了我們那班所謂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錯誤。反之，我所作的論述是說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創造了一些条件和情勢，使得一个平凡而可笑的人物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这本书如果加以修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色彩。因此，我只是改正了一些刊誤，并且刪掉了一些現在已經看不懂的暗喻。

我这部著作的結語——“但是，如果皇袍終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侖的銅像就将从汪东圓柱頂上被推下来”——這句話已經實現了。

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論1815年远征的著作中 开始了反对崇拜拿破侖偶像的攻击。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用进行历史研究、批評、諷刺和诙谐作为武器彻底打破了关于拿破侖的奇談。在法国境外，这个一反傳統民众信仰的激烈轉变，这个巨大的精神革命，很少使人注意，更不大为人所理解。

最后，我希望，我这个著作对于扫除那种流行的一——現今特別在德国流行的——关于所謂恺撒主义的童蒙詞句，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淺的历史的比拟时，人們忘記了主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羅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內部进行过，只是

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間进行过，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是战斗者的消极台柱。人們忘記了西斯蒙第所說的一句中肯的評語：羅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而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由于古代阶级斗争与现代社会斗争在物质經濟条件方面有这样根本的区别，所以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物之間，也就不能有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祭司长撒姆依尔之間所有的更多的共同点。

卡尔·马克思

1869年6月23日，倫敦

卡·馬克思专为其“路易·波拿巴的
雾月十八日”一书 1869 年在汉堡出版
的第二版而作

按第二版本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弗·恩格斯为本书 第三版作的序言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初版問世三十三年后还有印行新版之必要，就是证明这部著作至今还沒絲毫失去自己的价值。

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在一个事变——这个事变像晴天霹靂般震惊了整个政治界，这个事变在一些人中間受到了道义忿怒的高声叫罵，在另一些人中間被看作是从革命中解救出来的出路和对于革命誤入歧途的惩罚，但是这个事变在所有一切人們中間都是只引起过惊異，而却沒有被任何人了解的，——在这样一个事变剛一发生之后，馬克思立即发表一篇簡短的諷刺作品，里面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全部历史過程的內在联系，把12月2日的奇迹解釋为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結果，并且他这样解釋时除了对政变主人公表示完全應該的輕蔑之外，是用不着采取其他的态度的。馬克思把图画描繪得如此巧妙，使得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一些新的证据来证明这幅图画曾是把現實反映得极为眞确的。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了解得如此卓越，他在事变剛剛发生时就把事变的意义洞察得如此明白，这真是无可倫比的。

但要做到这个地步，曾需要有如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的精湛知識。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那里历史上发生的阶级斗争每一次都比其他各国更加达到彻底的結局；而这种阶级斗争所借以

进展以及斗争結果所由以表現的變易更替的政治形式，也是在那里造成得更为确定。法国在中世紀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等級君主國的模范，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而創立了純粹的資產階級統治，其所具有典型式的明显性实为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及。而抬起头来的无产阶级反对那占有統治的資產階級的斗争在这里所表現的尖銳形式，也是其他各国所未見过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馬克思不只特別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詳細考察了法国当时的历史，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所以，事变是从来也沒有使他張皇失措的。

此外还有另一种情况。正是馬克思最先发现了偉大的历史进展法則，按照这个法則，一切历史上发生的斗争（不論它是在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領域中发生的，或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領域中发生的），实际上只是各个社会階級彼此斗争的多少明显的表現，而这些階級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冲突，则是由它們經濟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換的性质和方式来制約的。这个法則对于历史的意义，是与“能力轉化律”对于自然科学的意义相同的，它在这里也是供馬克思用以理解第二法兰西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本书里，他用这段历史檢驗了他所发现的这个法則的正确性；虽然时间已过了三十三年，但我們还是必得承认这个試驗获得了光輝的成就。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弗·恩格斯专为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 1855 年在汉堡出版的第三版而作

按照第三版本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目 录

卡·馬克思为本书第二版作的序言	III—V
弗·恩格斯为本书第三版作的序言	VI—VII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108
一	1
二	12
三	25
四	41
五	52
六	71
七	92
注釋	109—116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¹

—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說过，一切偉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两次。他忘記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現，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現。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 年的山岳党代替 1793—1795 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² 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梦魔一样糾纏着活人的头脑。當人們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并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們战战兢兢地請出亡灵來給他們以帮助，借用它們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語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場面。例如，路德換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 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羅馬共和国和羅馬帝国的服装，而 1848 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 1789 年，时而又模仿 1793—1795 年的革命傳統。就像一个剛学会外国語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語言譯成本国語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

外国語言翻成本國語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語言来运用新語言的时候，他才算領会了新語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在觀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喚亡靈的行動時，立即就会看出它們中間的显著的差別。卡米尔·德穆蘭、丹东、羅伯斯比爾、聖茹斯特、拿破侖这些英雄人物，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羅馬的服装，讲着羅馬的語言來實現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一些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國內部創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競爭，經營分成小块的地產，利用解除了桎梏的民族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則到处破坏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給法国资產階級社會在欧洲大陸上創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連同一切复活的羅馬古董——所有这些布魯士斯、格拉古、普卜利科拉、护民官、元老以及凱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見了。冷靜务实的資產階級社會把薩伊、庫辛、魯瓦埃-科拉尔、本扎曼·孔斯旦和基佐当作自己真正的解釋者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統帥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領是肥头大耳的路易十八。資產階級社會完全埋头于財富的創造与和平競爭，竟忘記了古羅馬的幽靈曾經守护过它的搖籃。但是，不管資產階級社會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誕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戰和民族战斗的。在羅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傳統中，資產階級社會的斗士們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見自己的斗争的資產階級狹隘內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偉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例如，在一百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倫威尔和英國人民为了他們的資產階級革命，就借用过旧約全书

中的語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經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資产阶级改造已經實現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①。

由此可見，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贊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像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迴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蕩起来。

在 1848—1851 年間，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蕩，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 républicain en gants jaunes [戴着柔皮手套的共和党人]馬拉斯特起，直到用已死的拿破侖的铁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險家止。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而为了要消除这方面的一切疑問，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紀年、旧的名称、旧的布告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一个民族的感觉，就好像貝德勒姆³ 那里的一个癲狂的英国人的感觉一样，这个英国人把自己設想成古代法老的同代人，他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矿工劳动，因为他要在地下监狱般的埃塞俄比亚的金矿里辛苦劳动，借着系在他自己头上的一盞暗淡油灯的灯光，在一些手持长鞭的奴隶监视人的监督下劳动；矿洞口站着一群乱哄哄的野蛮兵士，他們既不了解劳役囚人，相互之間也不了解，因为大家讲着不同的語言。疯癫的英国人叹道：“我这个生来自由的不列顛人被迫忍受这一切，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还債，”——法兰西民族叹道。这个英国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頑固的念头。

^① 是聖經中的一个先知，見舊約全書“哈巴谷書”。——譯者注

法国人在从事于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12月10日的选举⁴就证明了这点。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们曾经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锅⁵，1851年12月2日事件便是对于这一点的报复。他们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对老拿破仑的漫画，他们得到的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仑本身，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所应当出现的老拿破仑。

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人民则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2月2日，二月革命被狡猾的骗子所葬送，结果，被消灭的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世纪以来的斗争从君主制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让步。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1851年12月的 coup de tête [轻率行为] 报复了1848年2月的 coup de main [勇敢打击]。来得容易，失去也容易。然而这两个事变之间的时间并不是白过了的。在1848—1851年期间，法国社会获得了（按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一些教训和经验，这些教训和经验在正常的即所谓按步就班地发展的进程中，本来应该在二月革命以前预先获得，以便使这次革命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事变，而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荡。看起来仿佛社会现

在忽然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創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創造为保证現代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絕對必需的形势、关系和条件。

資產階級革命，例如十八世紀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連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繽紛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滿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暫，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頂點，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領略其疾風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像十九世紀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經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經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們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們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們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們在自己无限宏偉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Hic Rhodus, hic salta!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⁶

但是，每个多少会觀察的人，即使他沒有逐步研究过法國事变发展的进程，也不免要預感到，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聞的屈辱。只要听一听民主派先生們当时那种自鳴得意的胜利叫囂就够了，这些先生們曾經互相祝賀，滿以为 1852 年 5 月第二个星期日⁷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結果。1852 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他們头脑中成了一种固定观念，成了一个教条，正如基督徒脑子里的基督再临和千年王国到来一样。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像中驅除了敌人就算打敗了敌人；他总是对自

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現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績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現實的一切感觉。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結成一个特別集團，來駁倒關於他們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見，他們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預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們的 *in partibus* [不存在的] 共和國（这些共和國的政府人員已由他們毫不挑剔地在暗中詮定了）拿到交易所里去貼現。12月2日像晴天霹靂一样震惊了他們。人民在意气消沉的时代总是乐意聆听叫得最响亮的呼喊者們的喊声来压抑自己內心的惊愕，这一次他們也許已經了解到：鵝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里的那种时代是已經过去了。

宪法、国民議会、保皇党派、藍色的和紅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鳴声、报刊的閃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譽、民法和刑法、*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自由、平等、博愛] 以及 1852 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見了，而这个人連他的敌人也不认为他是一个魔法师。普选权还保持了一剎那，好像仅仅是为着在全世界面前亲笔写下自己的遺囑，并以人民自己的名义宣布：“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⁸

像法国人那样說他們的民族遭受了偷襲，那是不够的。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隨便一个冒險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寬恕的。这样的言談并沒有揭穿哑謎，而只是把它換了一个說法罢了。还应当說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騙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虜呢。

現在我們来把法国革命从 1848 年 2 月 24 日到 1851 年 12 月所經過的阶段大致总结一下。

总共有以下三个明显的主要时期：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

期，或制宪国民議会时期（从 1848 年 5 月 4 日到 1849 年 5 月 28 日⁹）；宪制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議会时期（从 1849 年 5 月 28 日到 1851 年 12 月 2 日）。

第一个时期，从 1848 年 2 月 24 日到 5 月 4 日，即路易-菲力浦被推翻起到制宪議会开幕之日止（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二月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革命的序幕。这个时期的性质，正式表现于这一时期仓卒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临时性的。在这个时期所采取、試行和发表的一切，都像政府一样，一概宣布自己只是临时性的。无论什么人和什么机构，都不敢承认自己有长期存在，有权真正有所作为。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对派¹⁰、共和派的資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小資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工人，所有这些分子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

不这样也不可能。二月事变原先的目的只是要爭得选举制度的改革，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貴族独占的統治。但是，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人民已投入街垒斗争，当国民自卫軍采取消极等待的态度、軍队不进行认真抵抗而王室已經逃走的时候，成立共和国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釋共和国。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記，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这样就拟定了現代革命的总的內容，这个內容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在群众已达到的发展阶段上用現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經促进二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分子，都因在政府里获得最好的位置而心滿意足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其他时期都沒有当时那

样錯綜复杂，浮夸的空話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謀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陈規的頑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当巴黎无产阶级还陶醉于在它眼前展开的偉大前途并且认真地埋头討論各种社会問題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結，联合，醒悟过来，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

第二个时期——从 1848 年 5 月 4 日到 1849 年 5 月底——这是資產阶级共和国創立、奠定的时期。紧跟在二月事变之后，不仅王朝反对派被共和派弄得惊慌失措，共和派被社会主义者弄得惊慌失措，而且全法国都被巴黎弄得惊慌失措了。由全国选出而于 1848 年 5 月 4 日开幕的国民議会，是代表国家的。这个議会是对二月事变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議，并且是要把革命的結果降低到資產阶级的水平。巴黎无产阶级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个国民議会的性质，所以他們在国民議会开幕后不几天，即在 5 月 15 日，就曾經企图用强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将民族反动精神所借以威胁他們的这个机体重新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但是这个企图沒有成功。大家知道，5 月 15 日事变的結果，不过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領袖們，在我們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退出社会舞台罢了。

继路易-菲力浦的資產阶级君主制之后，只能有資產阶级共和国，就是說，以前是由資產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統治，今后将由全体資產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統治。巴黎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須終止的狂妄空想。对制宪国民議会的这个声明，巴黎无产阶级回答以六月起义，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

上最巨大的一次事变。結果获得胜利的仍然是資产阶级共和国。当时站在資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貴族、工业資产阶级、中等阶层、小資产者、軍队、組成別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識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資产阶级共和国胜利以后，起义者被屠杀的有三千多人，未經审問就被放逐的有一万五千人。无产阶级从这次失敗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每当运动好像又进入高潮时，无产阶级就企图再向前推进，可是这些企图愈来愈軟弱，成效也愈来愈小。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締結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失敗。但是，这些相继而来的打击，随着它們触及的社会面的扩大，也愈来愈弱了。无产阶级在議会和报刊方面的一些比較杰出的領袖，相继被捕判罪，代替他們的是些愈益模棱两可的人物。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實驗，醉心于成立交換銀行和工人团体，換句話說，醉心于这样一些形式的运动，即放棄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生存的有限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敗的。当六月事变中与无产阶级为敌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像无产阶级本身一样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偉大，也不能从重新締結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但是，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不愧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偉大斗争的光荣而失敗的；不仅法国，并且整个欧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惊动，而各个上层阶级后来的失敗所付的代价却如此便宜，以致得胜的党派只有公然无耻地加以夸張，才可以把这些失敗說成是事变。同时，失敗的政党离开无产阶级愈远，这些失敗就愈是可耻。

六月起义者的失敗，固然为資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爭論，而是别的問題。这次失敗揭示出，**資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統治。**它表明，在那些阶级划分比較发达、具有现代生产条件、具有那通过百年来的工作而使一切傳統观念都融化于其中的精神意識的旧文明国家里，**共和国一般只是資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改造的政治形式，而不是資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例如，像北美合众国那样；在那里，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換着自己的組成部分；在那里，现代的生产資料不仅不和經常人口过剩的現象相結合，反而弥补了头脑和人手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里，應該开辟新世界的物质生产所具有的狂热而充滿青春活力的进展，沒有給予人們时间或机会来結束旧的幽灵世界。

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團結成一个維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們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它們選擇了旧社会的格言**“財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軍队的口令，并用“汝将以此获胜！”这句話激励反革命十字軍。从这时起，那些曾經團結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的戰場，它就要被**“財产，家庭，宗教，秩序！”**这一口号所战胜。每当統治者集团范围縮小时，每当比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任何最單純的資产阶级財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淺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

当作“謀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当作“社会主义”加以指责。最后，连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三脚祭坛，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打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对那些站在自己的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为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¹¹就以“社会救主”的资格进入了土伊勒里宫。

二

現在讓我們重新回到被打斷的話題上來。

六月事變以後的制憲國民議會的歷史，是資產階級中的共和派統治和瓦解的歷史，這個派別是以三色旗的共和黨人、純粹的共和黨人、政治的共和黨人、形式的共和黨人等等稱呼聞名的。

這個派別在路易-菲力浦的資產階級君主制度下是正式的共和主義反對派，因而是當時政界中一個公認的構成部分。議院中有它的代表，在報界它也有相當大的勢力。它在巴黎的機關報“國民報”¹²，和“辯論日報”¹³一樣地算是受人尊敬的。它的性質和它在立憲君主制度下的這個地位也是相稱的。它並不是一個因有某些重大的共同利益而緊密團結、因有特殊生產條件而獨樹一幟的資產階級集團。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義思想的資產者——作家、律師、軍官和官吏組成的一個派系，這個派系之所以有影響，是由于全國對路易-菲力浦個人的反感，由於對第一共和國的懷念，由於一小群幻想家的共和主義信仰，而主要是由於法國人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對於維也納條約和對於同英國聯盟的憎惡，這個派別是始終予以鼓勵的。在路易-菲力浦的統治下，“國民報”的很大一部分擁護者都是因為它鼓吹這種隱蔽的帝國主義思想而獲得的，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後來在共和國時期，這種帝國主義思想就能以路易·波拿巴為代表，作為一個勝利的競爭者來同“國民報”本身對立。“國民報”也和其餘一切資產階級反對派一樣，曾經

对金融貴族作过斗争。反对預算案的論爭在当时的法国是同反对金融貴族的斗争完全相吻合的，这个論爭既然保证有可能博得非常便宜的声望，并吸取非常丰富的材料来写清教徒式的 leading articles [社論]，因而是不能不大受利用的。工业資产阶级感激“国民报”，是因为它奴顏婢膝地拥护法国的保护关税制度，而它维护这个制度又多半是出于民族的动机，而不是出于政治經濟上的动机。整个資产阶级感激它，则是因为它恶毒地誹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此外，“国民报”派是純粹的共和派，就是說，它要求把資产阶级統治的形式由君主国改为共和国，首先是要求保证自己能在这个統治中占优势。对于这一政治变革的条件，它的認識极其模糊。但有一点它看得十分清楚(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末期的改革运动的宴会上，这一点已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这就是它在民主派小資产者中间，特别是在革命无产阶级中间是不受欢迎的。这些純粹的共和党人(真是名副其实)本来已經完全准备好在开始时滿足奥尔良公爵夫人的摄政，恰好这时爆发了二月革命，因而他們那些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都在临时政府里获得了位置。他們当然是一开始就受到資产阶级的信任并在制宪国民議会中占了多数。临时政府中的社会主义分子馬上被排挤出国民議会开幕后成立的执行委员会；“国民报”派利用六月起义的爆发解散了执行委员会，从而清除了它的最切近的对手，即小資产阶级的或民主主义的共和党人(賴德律-洛兰等人)。卡芬雅克，这个指揮了六月屠杀事件的資产阶级共和派的将军，获得了一种独裁的权力，代替了执行委员会。“国民报”的前任总編輯馬拉斯特，成了制宪国民議会的常任議长；政府各部部长以及其他一切重要职位，都由純粹的共和党人占据了。

这样，实际情况超过了早就自命为七月王朝的合法继承人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最大胆的想望。但是，这个派别取得统治权并不是像它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就是说，并不是通过资产阶级举行反对国王的自由主义叛乱，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举行了被霰弹镇压下去的起义。资产阶级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脚下，但它不是从生活的树上落下来，而是从认识的树上落下来的。

资产阶级共和派独占的统治，只是从 1848 年 6 月 24 日起存在到 12 月 10 日止。这种统治的总结就是拟定共和主义宪法和宣布巴黎戒严。

新的宪法实质上不过是 1830 年宪章¹⁴ 的共和主义化的版本。七月王朝的过高的选举资格限制，甚至把资产阶级本身的一大部分人也排除于政治权力之外，这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这种选举资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普遍的选举权。资产阶级共和派不能把这一事件一笔勾销。他们只得补充了一个限制条款，规定选民必须是在选区居住六个月的。旧有的行政、地方自治、司法和军队等等组织，仍然原封不动；宪法上规定的某些变更，只涉及目录而没有涉及内容，只涉及名称而没有涉及事物。

人身、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信教等等的自由（1848 年各种自由权的必然总汇），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例如：“公民有权成

立团体，有權和平地、非武装地集会，有權进行請願并且通过报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发表意見。对于这些权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国宪法第II章第8条）“教育是自由的。教育的自由应在法律規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的最高监督下享用之。”（同上，第9条）“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这种不可侵犯性只有在遵守法定手續的条件下才能被破坏。”（同上，第3条）如此等等。所以，宪法要經常援引未来的构成法；这些构成法应当詳細地解釋这些附带条件并且調整这些无限制的自由权利的享用，使它們既不致互相抵触，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触。后来，这种构成法由秩序之友制定出来，所有这些自由都加以調整，結果，資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資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許“他人”在一定条件下（每一个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享受这些自由，那末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資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后来两方面都有充分权利援引宪法：一方面是廢除了所有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詞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廢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設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現實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然而，用这么巧妙的方法弄成不可侵犯的这个宪法，如同阿基里斯一样，有一个致命弱点，只是这个弱点不是在脚踵上，而是在头頂上罢了，或者不如說是在全部建筑物頂端的两个头脑上：一个

是立法議會，另一个是總統。只要把宪法浏览一遍，就可以看出：只有那些确定总统对立法議會的关系的条文，才是絕對的、肯定的、沒有矛盾的、不容絲毫曲解的。要知道，这里所談的問題，是要建立資产阶级共和派的可靠地位。按照宪法第 45—70 条規定，国民議會可以用合乎宪法的办法排除总统，而总统要排除国民議會却只能用違背宪法的办法，即只有取消宪法本身。可見，这里宪法本身是在号召以暴力来消灭自己。宪法不仅像 1830 年的宪章那样尊崇分权制，而且把这种分权制扩大到矛盾重重的地步。基佐曾經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在議會內的爭吵称为宪法力量的賭博，依据 1848 年的宪法，这种賭博一直是孤注一擲的。一方面是由普选产生并享有連选連任权的七百五十名人民代表构成一个不受监督、不可解散、不可分割的国民議會，它拥有无限的立法权力，最終决定宣战、媾和及商約等問題，独攬大赦权，因自己不間断地召集會議而經常站在政治舞台最前面。另一方面是具有王权的一切特性的总统，他有权不經国民議會而任免自己的內閣部长，他掌握行政权的一切手段，他可以分封一切官职，从而在法国操纵着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人的命运，因为正好有这么多的人在物质生活上依靠于五十万各級官吏和各級軍官。他統率一切武装力量。他享有赦免个别罪犯、解散国民自卫軍部队以及——經国务會議同意——罢免由公民自己选出的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市鎮委员会的特权。同外国締結條約时，他具有倡议和领导的作用。国民議會永远留在舞台上，是公众日常批評的对象，而总统却在极乐的土地上过着隐居的生活，不过他眼前和心里老是有宪法第 45 条在提醒他：*«frère, il faut mourir!»*¹⁵ 你的权力在你当选的第四年，在美丽的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要完結了！那时你的威严就要完蛋了，这

出戏是不会再演的，如果你負有債務，你就及时用宪法規定給你的六十万法郎的薪俸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进入克利希¹⁶！这样，宪法就把实际权力授給了总统，而力求为国民議会保证精神上的权力。可是，不用說，法律条文不可能創造精神上的权力，宪法就在这方面也是自己否定自己，因为它規定总统由所有的法国人直接投票选举。全法国的选票是分散在七百五十个国民議會議員之間，可是在这里它們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每一个議員不过是某个政党、某个城市、某个地方的代表，甚至只是表示必須选出一个人来湊足七百五十个議員，并不去特別注意事情本身和被选举者本人，可是总统是由全国人民所选出，选举总统是行使主权的人民每四年运用一次的王牌。民选的国民議会和国民只有形而上学的联系，而民选的总统却是亲自和国民发生联系。国民議会的各个議員的确反映着国民精神的多种多样的方面，而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化身。和国民議會比較起来，总统是一种神权的体现者：他是人民恩賜的統治者。

海的女神西蒂斯曾經預言阿基里斯要在盛年夭折。像阿基里斯一样有个致命弱点的宪法，也像阿基里斯一样預感到它命該早死。根本用不着西蒂斯离开海洋向共和国的創建人即純粹的共和派泄露这个秘密；这些共和派只要从自己的理想共和国的高空云层間俯瞰一下罪孽的尘世，就可以看到：他們愈是接近于完成他們那个偉大的立法艺术創作，保皇派、波拿巴派、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的倔强逞性以及他們自己的不孚众望的程度，也就与日俱增。他們力图用立宪的狡猾手腕，用宪法第111条来欺騙命运，根据这条規定，任何修改宪法的提案都必須經過每次相距一个月的三次討論，至少必須由四分之三的票数通过，而且参加表决的至少必須

有五百个議員。可是这只是为了要在他們已經事先預察到自己将来成为議会少数派时保持自己势力的一种无力的嘗試，这种勢力現在当他們还在議会中占多數并且握有一切政府权力手段时，就已經一天天地从他們的軟弱的手中滑出去了。

最后，在一个特別滑稽的条文中，宪法把自己托付給“全体法国人民和每一个法国人的警惕性和爱国心”，而在前面的一条中，它已經把有“警惕性”和“爱国心”的法国人托付給它故意发明出来的最高法院(«haute cour»)所实行的溫柔的刑事监护了。

1848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1851年12月2日不是被人头撞倒，而只是被一頂帽子碰倒了；誠然，这頂帽子是拿破侖的三角帽。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国民議会內忙于虛构、討論和表决这个宪法时，卡芬雅克却在国民議会外把巴黎控制在戒严状态中。巴黎戒严是制宪議会分娩共和国时的产前陣痛中的助产婆。如果說后来宪法被刺刀葬送了，那末不要忘記，在它还在母胎中时刺刀(是指向人民的)就保护过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帮助下出世的。“正直的共和派”的祖先們曾經拿着他們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欧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种发明，这种发明自己給自己开拓了通向整个大陆的道路，但是它又抱着永不熄灭的爱情回到法国，直到它終于在法国的半数的省里取得公民权为止。这一发明就是戒严。这是一項卓越的发明，每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机关头，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但是，既然兵營和露營是这样周期地重重压在法国社会头上，以便压制这个社会的意識并制服这个社会；既然馬刀和毛瑟枪周期地受命进行审判和管理，进行监护和檢查，执行警察和更夫职务；既然鬍子和軍服周期地被宣布为

社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導者，那末兵營和露營、馬刀和毛瑟槍、鬍子和軍服又怎么能不終于得出一個結論說：最好是宣布自己的制度是最高等形式，并使資產階級社會根本不必关心自治問題，从而一勞永逸地拯救社會！兵營和露營、馬刀和毛瑟槍、鬍子和軍服必然要产生这种想法，尤其是因為它們在這種場合下可以希望自己所建树的更高的功勞得到更多的現金報酬，而當它們按某一派資產階級的命令实行周期戒严和暫時拯救社會的時候，它們除了几个人的死傷和資產者的一些假笑之外，是很少获得实际利益的。为什么軍隊不可以終于搞出一次对它自己有利益有好处的戒严，同时把資產者的錢包也搜查一下呢？而且还不應忘記（我們順便提一提），貝爾納上校，即在卡芬雅克時期未經審判就把一万五千名起義者放逐的那位軍事委員會主席，現在又是巴黎各軍事委員會的領導人了。

如果說“正直的”純粹的共和派宣布巴黎戒严，从而創設了后来 1851 年 12 月 2 日的御用軍所賴以成长的苗床，那末同时屬於他們的还有另一种功績：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他們還点燃民族情感，而现在，当他們掌握了国家的一切权力的时候，他們却向国外列强跪拜，不去解放意大利，反而让奥地利人和那不勒斯人¹⁷再一次来奴役意大利。路易·波拿巴在 1848 年 12 月 10 日当选为總統，結束了卡芬雅克的独裁和制宪議会。

宪法第 44 条說：“曾經喪失过法国公民資格的人不能充当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路易·拿破侖·波拿巴不只丧失过法国公民資格，不只当过英国的特別警察，而且是一个已經归化了的瑞士人¹⁸。

关于 12 月 10 日选举的意义，我在另一个地方¹⁹已經詳細談

过，这里就不再談了。这里只須指出，12月10日的选举是曾經不得不支付了二月革命的費用的农民反对國內其他各个阶级的表現，是农村反对城市的表現。这次选举得到军队方面的巨大同情，因为军队从“国民报”派的共和党人那里既沒有取得光荣，也沒有領到附加軍餉；这次选举还受到大资产阶级方面的巨大同情，大资产阶级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恢复君主制度的一个跳板；选举也受到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的巨大同情，他們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对卡芬雅克的一种惩罚。下边我还要更詳細地談談农民对法国革命的态度。

从1848年12月20日到1849年5月制宪議会解散这个时期，包括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灭亡的历史。资产阶级共和派为资产阶级建立了共和国，把革命无产阶级赶下台，一时堵住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嘴，以后自己也就被资产阶级群众所排斥，这些人有充分权利把共和国据为自己的私有的財产。可是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是保皇派，其中有一部分（即大土地所有者）曾經在复辟时期居于統治地位，因而是正統派；另一部分（即金融巨头和大工业家）曾經在七月王朝时期居于統治地位，因而是奧尔良派。军队、大学、教会、律师、学院和报界的高官显貴，都分属于上述两派，虽然所占比例各不相同。这两部分资产阶级都把这个既不叫作波旁、也不叫作奧尔良、而是叫作資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它们能够共同进行統治的国家形式。六月起义已經把他們联合成“秩序党”，現在應該是把还在国民議会中占有地位的一帮资产阶级共和派排斥出去的时候了。这些純粹的共和派曾經极其殘暴地濫用武力对付人民，而現在，当需要捍卫他們自己的共和主义和自己的立法权力以对抗行政权力和保皇党人时，他們却极其怯懦地、畏縮地、沮丧地、

軟弱无力地放棄了斗争。我用不着在这里叙述他們解体的可耻历史。他們不是灭亡了，而是无形消失了。他們已經最終演完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往后的时期中，不論在議會內或議會外，他們都仅仅表現为过去的影子，每当問題涉及到共和国的名称，每当革命冲突有下降到最低水平的危險时，这些影子便又复活起来。順便指出，把自己的名称交給这个派别的“国民报”，在后来一个时期就轉到社会主义方面去了。

在結束这一时期之前，我們還應該回顾一下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从 1848 年 12 月 20 日起到制宪議會結束时止是并居在一起的，而且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那天，其中的一种力量消灭了另一种力量。我所指的一方是路易·波拿巴，另一方是联合的保皇党，即秩序党，大資产阶级的党。波拿巴就任总统后立即組織了以奧迪隆·巴罗为首（請注意，即以議會資产阶级的最自由主义的一派的老領袖为首）的秩序黨內閣。巴罗先生終于获得了 1830 年以来他朝思暮想的內閣职位，并且是內閣总理的职位。然而这个位置并不是像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得到的，不是以議會反对派的最先进領袖的身分得到的，而是以他的一切勁敌即耶穌会派和正統派的同盟者的身分得到的，而且他的任务是把議會送进坟墓。他終于把新娘迎来举行婚礼，然而只是在新娘被污辱以后才迎来的。波拿巴本人好像是完全退隐了。代他行动的是秩序党。

在內閣第一次會議上就决定派出远征軍去羅馬，并且商定要瞞着国民議會来安排这件事，而經費却要假造口实向国民議會索取。这样，內閣就开始以欺騙国民議會和暗中勾結外国专制国家的办法来对付革命的羅馬共和国了。波拿巴也用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手段准备了反对保皇党立法議會及其立宪共和国的 12 月 2

日政变。不要忘记，在1848年12月20日组成波拿巴内阁的那个政党，又是1851年12月2日的国民立法议会中的多数。

8月间制宪议会曾经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未制定并公布一套补充宪法的构成法以前，它不解散。1849年1月6日，秩序党通过议员拉托建议议会不要去搞什么构成法，最好是通过一项关于解散自己的决议。这时，不仅是以奥迪隆·巴罗先生为首的内阁，而且国民议会中的全体保皇党议员，都以命令口吻对国民议会说：为了恢复信用，为了巩固秩序，为了终止不确定的暂时状态而建立完全确定的状态，必须解散国民议会；议会妨碍新政府进行有效的工作，它只是由于执迷不悟才企图延长自己的生命；它已经使全国感到厌恶了。波拿巴把这一切攻击立法权的说法都记在心里，熟读了这些说法，并在1851年12月2日向议会保皇派证明，他确实从他们那里学得了一些东西。他把他们自己的口号拿来反对他们。

巴罗内阁和秩序党往前更进了一步。他们在全法国掀起了向国民议会请愿的运动，殷勤地请求国民议会隐退。这样，他们就把无组织的人民群众引入反对国民议会、反对依照宪法手续组织起来的民意表现的斗争。他们教会波拿巴从诉诸议会转而诉诸人民。1849年1月29日那天，制宪议会终于不得不解决关于自行解散的问题了。这一天，军队占据了国民议会举行会议的场所；总揽国民自卫军和常备军指挥大权的秩序党将军尚加尔涅，就像是在会战前夕一样在巴黎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而联合起来的保皇党人威胁议会说，如果它不表示让步，就将使用暴力。国民议会果然表示愿意让步，但商定再苟延一个短短的时期。1月29日是什么呢，岂不就是1851年12月2日那样的coup d'état [政变] 嗎？不

过这次是由保皇党人协同波拿巴反对共和派国民議会罢了。保皇党老爷們沒有看到或是不願意看到，波拿巴利用 1849 年 1 月 29 日事变，迫使一部分军队在土伊勒里宮前受他檢閱；他貪婪地抓住这个公然訴諸武力来反对議会的初次尝试，为的是提醒大家想起卡利古拉²⁰ 的故事。他們当然只看見了他們的尙加爾涅。

特別推動秩序党使用暴力去縮短制宪議会生命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补充宪法的所謂构成法——教育法、信教法等等。联合的保皇党人认为极其重要的，是他們自己制定这些法律，而不是让那些疑虑重重的共和党人去制定。可是，在这些所謂构成法中，还有一个关于共和国總統的責任的法律。1851 年立法議会正从事于制定这个法律，波拿巴就以 12 月 2 日的 coup [打击] 防止了这一 coup。联合的保皇党人在 1851 年冬季議会运动时期，是多么希望有一个現成的總統責任法，并且是由疑虑重重的、敌对的共和派議会制成的總統責任法啊！

当制宪議会在 1849 年 1 月 29 日自己毀坏了自己的最后的武器以后，巴罗內閣和秩序之友便对它进行了无情的迫害。他們不放过一个机会来贬低它，强迫这个軟弱无力的和对自己絕望的議会通过一些使它失去最后一点社会尊敬的法律。波拿巴沉溺于自己的頑固的拿破侖观念，竟公开利用議会权力的这种贬低。例如，当国民議会 1849 年 5 月 8 日譴責內閣让烏迪諾將軍占領契維塔未克基亞，并命令罗馬远征軍回到它原来的目标时²¹，当天晚上波拿巴就在“通报”上发表了致烏迪諾的一封信，祝賀这位將軍建树了英雄的功績，并且和那些卖弄笔墨的議員相反，裝出一副寬大为怀的袒护军队的姿态。保皇党人对此加以譏笑。他們相信他們一定能愚弄他。最后，当制宪議會議長馬拉斯特偶尔怀疑到国民議

会的安全，根据宪法責令一个上校率领所部开来保护国民議会时，那个上校却以軍紀为借口而拒絕調动，并建議馬拉斯特去跟尙加爾涅交涉，但尙加爾涅也拒絕了馬拉斯特的要求，并且刻毒地說，他不喜欢 baionnettes intelligentes [能思想的刺刀]。1851年11月，联合的保皇党人在他們准备同波拿巴开始作决定性的斗争时，曾經企图在他們的所謂議会总務官法案²² 中規定国民議會議长能直接調动军队的原則。他們的一位將軍勒夫洛签署了这个法案。但是，尙加爾涅白白地投票贊成了这一法案，梯也尔也白白地贊揚了已故制宪議会的有远見的智慧。陆军部长圣阿尔諾像尙加爾涅回答馬拉斯特一样回答了他，他的回答还博得了山岳派的鼓掌！

当秩序党还只是內閣而不是国民議会的时候，它就这样玷污了議会制度。而当1851年12月2日政变把議会制度逐出法国的时候，它就叫喊起来了！

我們祝議会制度一路平安！

三

立法国民議會于 1849 年 5 月 28 日开会，到 1851 年 12 月 2 日被解散。这一期間是立宪共和国或議會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統治以后是吉倫特派的統治；吉倫特派統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統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綫行进。

1848 年革命的情形却剛剛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資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屬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 4 月 16 日、5 月 15 日和 6 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敗。民主派又全靠資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資产阶级共和派还没有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它就把这个麻煩的伙伴抛棄，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聳了聳肩膀，抛开資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經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而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难怪乎它們在这种可笑的姿勢中失去平衡，并且裝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臉，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綫行进。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

样开起倒车来了。

我們所談的这个时期，包含着各种惊人的矛盾的最复杂的混合，立宪派公开組織阴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議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議會方式进行活动；山岳派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預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現在的失敗；保皇派扮演着共和国 *patres conscripti* [參議員] 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支持他們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朝，而在法國內部却支持他們所憎恨的共和国；行政权把自己的軟弱当作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輕蔑看作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最卑鄙的方面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結合；联盟以各自分离作为基础；斗争是以不把斗争貫彻到底作为根本的規律；无謂的煽动，是为了安宁；最隆重地宣揚安宁，是为了革命；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有英雄而无功績；有历史而无事变；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它仿佛只是同一的緊張和松弛状态的不断反复；对立形势周期地达到高度尖銳化，好像只是为了鈍化和緩和，但始終不能得到解决；一方面是裝腔作勢的努力和害怕世界灭亡的市儈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却是救世主們醉心于极小器的傾軋手段和宮廷斗争的小丑姿态，他們这种无忧无慮的作法使人想起的不是末日的审判，而是弗倫特运动^① 时期的情景；全法国的全部官方天才，在一个人的狡猾的愚鈍前面甘拜下風；国民共同意志每次經過普选來表現时，都在群众利益的頑固的敌人身上得到适当的表現，一直到最后它在一个騙子的固执的意志上得到了

① 是指十七世紀中叶在法国发生的反对王权的运动。当时的貴族統治阶级把它称为“弗倫特运动”。弗倫特是一种被禁用的投石器，也是搗乱或破坏秩序的代用語。——譯者注

表現。如果历史上曾經有一頁是被塗抹得灰色而又灰色的話，那就正是這一頁。人物和事变仿佛是些顛倒的施萊米尔——沒有肉体的影子²³。革命自己麻痺自己的體現者，而把热情的强力完全賦予自己的敌人。如果說，反革命派不停地召喚來的“紅色怪影”終于出現，那末它出現時就不是戴着无政府主义的弗利基亞帽，而是穿着秩序的制服、紅色的軍褲。

我們已經看到，波拿巴在 1848 年 12 月 20 日就職時所組成的內閣，是秩序黨的內閣，即正統派和奧爾良派的聯合內閣。這個或多或少用強力縮短了共和主義制憲會議壽命的巴羅一法卢內閣，直到制憲會議死後還在執掌政權。聯合保皇黨人的將軍尚加爾涅繼續執掌着正規軍第一師和巴黎國民自衛軍的最高統帥權。最後，普選保證秩序黨在立法議會中取得極大多數的席位。在立法議會中，路易-菲力浦的眾議院議員和貴族院議員，已同一群神聖的正統主義者匯合起來了，對於這些正統主義者來說，國民的大量的選票變成了政治舞台的入場券。波拿巴派的議員人數太少，不足以構成一個獨立的議會黨團。他們只不過是秩序黨的一個 *mauvaise queue* [可憐的附屬物]。這樣，秩序黨就掌握了政府權力、軍隊和立法機關，一句話，掌握了全部國家政權；這個國家政權在精神上是靠着把它的統治炫示為民意表現的普選、靠着反革命勢力在整個歐洲大陸上同時獲得的勝利而加強起來的。

从来還沒有一个政党拥有这样强有力的手段和在这样良好的征兆下开始斗争。

罹難的純粹的共和派在立法國民議會中只剩下了一個以非洲的將軍卡芬雅克、拉摩里西爾和貝多为首的、由五十人組成的集團。大的反对党是山岳党——这是社会民主派給自己取的議會名稱。

在国民議会七百五十个席位中，它占有两百多个，所以它至少是和秩序党三个派別中任何一派同等强大的。它和整个保皇派联盟相比之下所占的相对少数地位，好像是由于特殊情况而趋于平衡了。不仅各省的选举表明山岳党在农村居民中获得很多拥护者，而且差不多全体巴黎議員都是属于山岳党的；军队以选出三个下級軍官来表明它的民主主义信念，而山岳党的首領賴德律-洛兰（与秩序党的一切代表不同）是由五个省的选民投票抬上了議員地位的。这样，在 1849 年 5 月 28 日，山岳党（在保皇党内部，以及在整个秩序党和波拿巴中間必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看来是完全可望获得成功的。可是，两星期以后，它竟失掉了一切，包括声誉在內。

在我們繼續叙述議会的历史以前，为着避免在估計我們所考察的这个时代的总的性质时通常易犯的錯誤，需要作几点說明。在民主派看来，无论在制宪国民議会时期或在立法国民議会时期，問題都不过是在于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間的斗争。他們把运动本身概括为一个詞儿：“反动”——黑夜，这时所有的猫都是灰的，而他們也可以滔滔不絕地倾泻出他們的更夫的老生常談。当然，初看起來，秩序党好像是各种保皇派集团的結合体，这些集团不仅互相倾軋，以便把自己的王位追求者捧上王位，把对方的王位追求者排挤掉，而且它們一致对“共和国”表示仇恨，一致对“共和国”进行斗争。和这些保皇派的阴谋家相反，山岳党好像是“共和国”的保护人。秩序党似乎是永远忙于“反动”，而这种“反动”（完全像在普魯士一样）是反对出版、結社等等，并且（又像在普魯士一样）是以官僚、宪兵和法庭进行粗暴的警察干涉的方式实现的。“山岳党”同样毫不停息地忙于抵抗这种攻击，忙于保护“永恒的人权”，好像近一百五十年以来每个所謂的人民政党所多多少少做过的那

样。可是，只要更仔細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政党，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和这个时期特有容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我們已經說过，正統派和奧爾良派是秩序党中的两个巨大集团。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們的王位追求者并使它們互相分离呢？难道只是百合花^① 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奧爾良王室，各种色彩的保皇主义或是它們的保皇主义信仰嗎？在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統治的是大地产連同它的僧侶和僕从；在奧爾良王朝时期进行統治的是金融貴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資本和它的随从者——律师、教授和健談家。正統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襲权力的政治表現，而七月王朝則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戶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現。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謂的原則，而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它們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間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資本和地产間的竞争。当然，把它們同某个王朝联結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見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則，这有誰会否认呢？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聳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創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傳統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奧爾良派和正統派这两个集团中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別人相信它們彼此分离是由于它們对两个不同王朝的眷恋，那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剛剛相反，正是它們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

① 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象征。——譯者注

朝不能結合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評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應該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們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們对自己的看法同它們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奥尔良派和正統派同处于共和国中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那末这只是表明，由資產阶级分化出的两大集团（地产和金融資本），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統治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从屬地位。我們談論資產阶级的两大集团，是因为大地产虽然还摆着封建主义的資格，抱着高貴門第的高傲态度，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已經完全資產阶级化了。例如，英国的托利党人曾长期认为，他們是热中于王权、教会和旧目的英国宪法，直到危急的关头才被迫承认，他們仅仅是热中于地租。

联合的保皇党人在报刊上，在爱姆斯，在克勒蒙特²⁴，在議会之外，总是互相倾軋。在幕后，他們又穿起他們旧时的奥尔良派的和正統派的制服，进行他們的旧时的比武。但是在公开的舞台上，在正式演出时，在扮演一个巨大的議会政党的角色时，他們对自己的可敬的王朝只是敬而远之，in infinitum〔无止境地〕推迟君主制的复辟。他們在从事自己的真正事业时是以秩序党的姿态出現，即举着社会的旗帜，而不是举着政治的旗帜；是作为資產阶级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为出游公主的騎士；是作为和其他阶级对立的資產阶级，而不是作为和共和党人相对立的保皇党人。作为秩序党，他們也比先前任何时候，比复辟时期或七月王朝时期，享有更加无限和更加稳固地統治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只有在議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法国资產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互相結合起来，从而把自己的阶级

的統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這一階級中的一個特權集團的統治。如果他們以秩序黨身分痛罵共和制，并不掩蓋他們對共和制的憎惡，那末這就不仅是由于保皇主义的回忆了。本能告訴他們，共和制虽然完成了他們的政治統治，同时却破坏着這一統治的社会基础，因為他們現在必須面對各个被奴役的階級并且直接和它們斗争，不能用王冠作掩护，不能用相互之間以及和王权之間的次要斗争來轉移全國的視線了。由于感觉到自己軟弱无力，他們才不得不在他們階級統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縮下来，力圖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險也較少的階級統治的形式上去。相反地，每当联合的保皇党人和敌視他們的王位追求者即波拿巴发生冲突时，每当他們担心行政权力危害他們的議會的万能权力时，每当他們因此必須把自己統治的政治合法性提到首位时，他們就不是以保皇党人的身分出面，而是以共和党人的身分出面，从奧爾良派的梯也尔起直到正統派的貝利耶止都是如此：前者曾向国民議會担保說，关于共和国的問題，他們的意見最少分歧；后者纏着三色头巾，以演說家的姿态，在1851年12月2日代表共和国向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前面的人民群众发表演說。的确，有一陣譏笑的回声响应着他：Henri V！ Henri V！〔亨利五世！亨利五世！〕

和資产阶级的联合相对抗的，是小資产者和工人的联合，即所謂社会民主派。1848年六月事变以后，小資产阶级发觉自己受了騙，它的物质利益受了損失，而那些应当保证它有可能捍卫这种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威胁。因此，它就和工人接近起来。另一方面，它在議會中的代表，即山岳党，在資产阶级共和派专政时期被排挤到后台去了，在制宪議会存在的后半期中，因为同波拿巴及保皇派閣員们进行了斗争，又重新获得了已失去的声望。

山岳党和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结成了同盟。1849年2月在宴会上庆祝了和解，制定了共同纲领，设立了共同的选举委员会，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失去革命的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党。由这种联合产生出来的新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除了几个工人阶级出身的配角和几个社会主义的宗派分子外，还是和旧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一样，不过是人数多一点罢了。但是，逐渐地它就随着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一同变化了。社会民主党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他们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实质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超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山岳党为了共和国和所謂的人权不断同秩序党作斗争时，共和国或人权并不是它的最終目的，正像一支将被繳械的军队进行反抗和投入战斗时并不只是为了保留自己的武器一样。

国民議会剛一开幕，秩序党就向山岳党挑战。資产阶级这时已感到必須击破民主派小資产阶级，正如他們在一年以前感到必須击破革命无产阶级一样。不过这次敌方的情况已是另一个样子了。无产阶级党的力量是在街上，小資产阶级的力量却在国民議会中。因此必須趁时间和情勢还没有把这种力量巩固起来的时候，就把它从国民議会引誘到街上，使它自己摧毁它在議会中的力量。山岳党便纵馬飞奔到陷阱中去了。

把山岳党引入陷阱的誘餌是法軍炮轰羅馬。这次炮轰違反了宪法第 V 条²⁵，因为該条禁止法兰西共和国使用自己的兵力侵犯他国人民的自由。此外，宪法第 54 条还禁止行政机构不經国民議会同意宣布战争，而制宪議会在 5 月 8 日的決議中曾指責远征羅馬的举动。賴德律-洛兰以此为根据在 1849 年 6 月 11 日对波拿巴和他的部长們提出彈劾案。他被梯也尔的刻毒的譏刺所激怒，威胁說将用一切手段，甚至将使用武力来保卫宪法。山岳党全体一致起立，重申这个使用武力的号召。6 月 12 日，国民議会否决了彈劾案，于是山岳党就退出了議会。6 月 13 日的事变大家都知道：一部分山岳党人发表宣言，宣布波拿巴和他的部长們“处在宪法之外”；民主派的国民自卫軍徒手举行示威游行，遇到尚加爾涅的军队就逃散了，如此等等。一部分山岳党人逃到国外，另一部分被交付布尔日最高法院审訊，余下的山岳党人則像小学生一样，按照議会規則受到国民議會議長的瑣碎的监督。巴黎重又宣布戒

严，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民主派部分被解散了。山岳党在议会中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在巴黎的力量就这样被消灭了。

6月13日事变时成了工人流血起义的信号的里昂，也和邻近的五个省同时宣布了戒严。戒严状态一直继续到现在。

山岳党大多数背叛了自己的先锋队，拒绝在它的宣言上签名。报刊也临阵脱逃了；只有两家报纸敢于登载这个宣言。小资产者背叛了自己的代表；国民自卫军没有露面，即使在某处露了面，也只是阻挠街垒的堆筑。代表们欺骗了小资产者：军队中的假同盟者根本没有露过面。最后，民主派不但没有从无产阶级中去汲取力量，反而把自己的懦弱传染给无产阶级，并且正如民主党人一切伟大行动中常有的情形那样，领袖们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人民”背叛了他们，人民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领袖欺骗了他们。

很少看到什么事情比山岳党当前的进军喧嚷得更厉害；很少看到谈论什么事情像现在吹嘘民主派必然胜利这样自信、这样迫不及待。显然，民主党人是相信使耶利哥城的墙壁应声倒塌的喇叭声音的力量的。每当他们站在专制制度的墙壁面前时，他们就力图重复这个奇迹。如果山岳党真想在议会中获得胜利，它就不应该号召使用武力。如果它在议会中号召使用武力，它就不应该在街上采取议会式的行动。如果它认真考虑过和平示威，那末它没有预先看到示威将受到武力的干涉，就很愚蠢了。如果它想过实际的战斗，那末放下战斗所必需的武器，就是件怪事了。可是问题在于，小资产者和他们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胁，不过是企图吓唬一下敌人罢了。当他们错误地走入死胡同里面时，当他们跑得太远，以致不得不把他们的威胁付诸实行时，他们就采取

模棱两可的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敗的口实。一旦情况严重到必須实地战斗时，宣战的震耳欲聋的前奏曲就变成怯懦的唠叨；演員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像吹脹了的氢气球一样，針一刺就破灭了。

沒有一个政党像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沒有一个政党像民主党这样輕率地錯誤估計局势。当一部分军队投票贊成山岳党的时候，山岳党就认为，军队会举行起义来拥护它。而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这样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在军队看来只有一个意思，即革命家站在羅馬士兵方面反对法國士兵。另一方面，人們对 1848 年的六月事变的記憶还太新鮮，以致无产阶级对国民自卫軍深恶痛絕，秘密团体的領袖們对民主派的領袖們表示很不信任。要消除这些矛盾，必須有受到威胁的重大的共同利益出現。宪法某一抽象条文的破坏，并不能激起这种利益。如民主党人自己所說，难道宪法不是已經被人破坏了許多次嗎？难道最流行的報紙不是已經責罵宪法是反革命一手造成的嗎？但是，民主党人代表小資产阶级，即代表两个阶级的利益同时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所以他認為自己完全是站在阶级对抗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們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但他們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他們所維护的都是人民的权利；他們所关心的都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們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状况。他們不必过分仔細地估量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可是，如果事实表明民主党人的利益并不使人关心，他們的力量是軟弱无力，那末这就應該归罪于危險的詭辯家，他們把統一的人民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陣營，或者是由于军队太残忍，太盲目，因而不能

把民主党人的純正目的当作自己的利益，再不然就是由于执行中的某种細节使全部事情垮了台，最后，或者是某种意外的偶然事件使事情沒有成功。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敗时总是洁白无瑕，正像他进入这种失敗时是純洁无辜一样；他摆脱失敗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以为他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自己和他的党應該放棄旧的观点，相反地，是情勢應該来适应他。

因此，不应当以为人数大大削减、备受挫折并被新的議会規則所侮辱的山岳党是太不幸运了。虽然 6 月 13 日的事变排挤了它的領袖，但是这一天又給第二流的“能者們”騰出了位置，这个新地位使得他們得意忘形。虽然他們在議会中軟弱无力的情况已經无可怀疑，但是他們現在已經有权把他們的行动局限于道义上的憤怒和虛張声势的言論了。虽然秩序党把他們这些最后正式代表革命的人物看作无政府状态一切可怕現象的体现者，但是他們在实际上已能够表現得更平庸、更温和了。关于 6 月 13 日的失敗，他們意味深长地安慰自己說：“只要他們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我們就会向他們显出我們的本事来！*Nous verrons!* [走着瞧吧!]”

至于那些逃到国外的山岳党人，那末这里就只須指出：賴德律-洛兰在不过两星期的时间內就把他所領導的强大政党不可挽回地断送了，在这以后，他竟觉得自己負有使命 *in partibus* [在国外]組織一个法国政府；他这个远离行动舞台的人物，似乎将随着革命水平的下降，随着官方法国的官方人物变得愈益矮小而愈益高大起来；在 1852 年的应届选举中，他能以共和派竞选人的資格出面；他不断向瓦拉几亚的人民和其他地方的人民发出通告，威胁說要以他自己和他的同盟者的轰轰烈烈的行动来对付大陆上的

专制暴君。蒲魯东曾向这班老爷們說过：«Vous n'êtes que des blagueurs!»[“你們就是会空談!”]他这样說难道沒有一点道理嗎？

6月13日，秩序党不仅击破了山岳党的勢力，同时还执行了宪法应服从国民議会多數派的決議的原則。它对共和国的理解是：在共和国里，資产阶级通过議会形式實現統治，它不像在君主國里那样既要受行政机构否决权的限制，又要受行政机构解散議会的权力的限制。根据梯也尔所下的定义，議会制共和国就是这样。可是，如果說資产阶级在6月13日保证自己在議会範圍內取得了无限的权力，那末它把議会中最孚众望的議員排除出去，岂不是严重地削弱了議会对付行政权力和人民的力量，因而使議会本身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嗎？它既然毫不客气地把許多議員交付法庭审判，也就是廢棄了它本身的議会不可侵犯性。它迫使山岳党議員遵守的那个屈辱性的規則，大大提高了共和国总统的地位，因而也就大大贬低了每一个人民代表。它指責为保护宪法而举行的起义是图謀顛复社会的无政府行动，也就是自己剥夺了自己在遭受行政权力違犯宪法的侵犯时訴諸起义的机会。历史真能捉弄人！1851年12月2日，秩序党痛哭流涕、但徒劳无益地向人民推荐了一位抵禦波拿巴而保护宪法的將軍烏迪諾，这位將軍曾按照波拿巴的命令炮轰了羅馬，因而成为6月13日护宪騷动的直接原因。6月13日的另一个英雄維埃伊拉，曾經率領一帮属于金融貴族的国民自卫軍毫不知耻地在民主报社內胡作非为，因而受到国民議会讲坛上的称赞；这个維埃伊拉竟参加了波拿巴的阴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国民議会在生死关头失掉了国民自卫軍方面的任何援助。

6月13日的事变还有另一种意思。山岳党曾力求把波拿巴

交付法庭审判。所以，山岳党的失败也就是波拿巴的直接胜利，也就是波拿巴个人对他那些民主派敌人的胜利。秩序党赢得了这个胜利，而波拿巴只要把这次胜利写在自己的账簿上就行了。他这样做了。6月14日，巴黎各处墙壁上张贴了一个布告，据布告所说，总统好像并没有参与这一切，好像他也并不愿意，只是为事变所迫才离开他的僧院式的隐居生活，他以被人误会的善人口吻抱怨敌人对他的诽谤，他仿佛把他个人和秩序的事业等同起来，实际上却是把秩序的事业和他个人等同起来。此外，虽然国民议会后来批准了罗馬的远征，但这次远征是由波拿巴发起的。波拿巴恢复了祭司长撒母耳在梵蒂岡的权力以后，便可以指望以大卫王的姿态进入土伊勒里宮了²⁶。他已把僧侶拉到自己方面来了。

我們已經說过，6月13日的騷动只是局限于和平的游行示威。所以，在对付这次騷动的斗争中，是說不上什么軍事勳业的。然而，在这个很少有英雄人物和事变的时期，秩序党就把这个不流血的战斗变成了第二个奧斯特尔利茨^①。讲坛和報紙都称赞军队，說它是秩序用来对抗那些反映无政府状态的軟弱无力的人民群众的一种力量，而尙加爾涅則被称頤为“社会中坚”——这个骗局，最后連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这时，那些仿佛是形迹可疑的军队，都被悄悄地調出了巴黎；那些在选举中表露出濃厚的民主倾向的团队，都从法国調往阿尔及利亚去了；士兵中不安分的分子，都被送入了懲罰营；最后，报刊漸漸和兵營完全隔絕，而兵營漸漸和市民社会完全隔絕了。

在这里我們已經談到了法國國民自卫軍历史上的决定性的轉

① 奧斯特尔利茨是現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拉夫科城的旧称。1805年12月2日拿破侖第一在这里击败了俄奥联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譯者注

折点。1830年，国民自卫軍决定了复辟的垮台。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如果国民自卫軍和军队一致行动，每次暴动都要遭到失败。当国民自卫軍在1848年的二月事变中对起义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对路易-菲力浦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时，路易-菲力浦就认为自己一定要完蛋，而事情果然也就是这样。于是就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革命沒有国民自卫軍便不能胜利，而军队受到国民自卫軍的反对就必然失败。这是军队对市民万能的一种迷信。在1848年六月事变中，当全部国民自卫軍协同正规軍镇压了起义的时候，这种迷信更加牢固了。从波拿巴就任总统时起，由于違反宪法地把国民自卫軍的指挥权和正规軍第一师的指挥权统一在尚加尔涅一人身上，国民自卫軍的作用才稍稍降低了一些。

国民自卫軍的指挥权在这里好像成了最高軍事統帅的标志，同样，国民自卫軍本身也带有只是正规軍的附屬物的性质了。最后，在6月13日国民自卫軍已經被粉碎：不仅是由于从这一天起它在法国全国各地都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被解散，直到它只剩了一些碎屑为止。6月13日的示威游行首先是国民自卫軍中民主派部分的示威游行。固然，他們用来和军队对抗的，不是自己的武器，而只是自己的軍装；可是，护身符就在于这个軍装。军队知道，这种軍装和其他任何軍装一样，是一块破毛料。魅力消失了。1848年六月事变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国民自卫軍为代表同军队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1849年6月13日，资产阶级在军队的帮助下驅散了小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軍；1851年12月2日，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軍也已经不存在了，当波拿巴后来签署解散国民自卫軍的法令时，他只是确认了既成的事实。资产阶级就这样自己毁坏了自己对抗军队的最后一个武器，但是自从小资产阶级已

不像一个忠順的臣僕一样地支持它而像一个反叛者一样地反对它的时候，它就已經應該毀坏这个武器了。一般說来，資產阶级一当自己成为专制者的时候，它就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用来对付专制制度的一切防御手段尽行毀坏。

这时候，秩序党却在庆祝政权重新回到它手里（1848年它失掉了这个政权，好像只是为了1849年它摆脱一切羈絆的时候重新把它收回来），它对共和国和宪法橫加侮辱，咒罵未来、現在和过去的一切革命，甚至連它自己的領袖所完成的革命都包括在內，最后还頒布了箝制报刊言論、消灭結社自由和把戒严状态規定为正常制度的法律。接着，国民議会从8月中旬到10月中旬停止了开会，任命了休会期間的常任委員會。在休会期間，正統派和爱姆斯一起进行阴谋活动，奥尔良派和克勒蒙特一起进行阴谋活动，波拿巴借皇帝式的巡游来进行阴谋活动，而各省議会則在为修改宪法召开的會議上施展阴谋，这是国民議会定期休会时期照例发生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只有在它們具有事变的性质时，我才較为詳細地予以論述。不过这里还應該指出，国民議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退出舞台，只留下路易·波拿巴这一个——虽然是一个可怜的——人物在众目共睹之下占居共和国首腦的地位，国民議会的这种举动是失策的，而这时秩序党却分解为各个具有彼此敌对的复辟欲望的保皇派构成部分来使公众感到难为情。每当这种休会期間議会的喧鬧声趋于沉寂而議会的身体消融到国民里去的时候，就显然可以看出，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只缺少一件东西——使議会的休会繼續不断，并把共和国的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自由，平等，博愛] 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 *Infanterie, Cavalerie, Artillerie!* [步兵，騎兵，炮兵！]

四

1849年10月中旬，国民議会复会。11月1日，波拿巴送給議会一个咨文，說巴罗一法卢內閣已經免职，新內閣已經組成，这使議会大为震惊。就是驅逐一个僕人也不会比波拿巴驅逐自己的內閣閣員那样更加蛮横无礼。預定要向国民議会踢去的一脚，先踢到巴罗和他的同僚身上了。

我們已經說过，巴罗內閣是由正統派和奧爾良派組成的。这是秩序党的內閣。波拿巴需要这个內閣，是为了要解散共和派的制宪議会，实现对羅馬的远征，并摧毁民主派的力量。那时他好像躲到这个內閣背后，把政府权力让給了秩序党，戴上了路易-菲力浦时期报纸的責任发行人常戴的朴质的假面具，即 *homme de paille* [冒名頂替者] 通常戴的假面具。現在他把假面具丟掉了，因为这个面具已不是一个使他能够隐藏自己的面容的薄紗，而是已变成一个妨碍他显示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的铁制面具了。他任命巴罗內閣，是要借秩序党的名义驅散共和派的国民議会；他解散这个內閣，是宣布他自己的名字和这个秩序党的国民議会无关。

要解散巴罗內閣是不乏正当借口的。巴罗內閣在对待共和国总统这个和国民議会并存的权力时，甚至連必須遵守的礼节都忽視了。在国民議会休会期間，波拿巴发表了致埃德加尔·奈的信，其中好像是指責教皇^① 的非自由主义行动，正像他曾撇开制宪議

① 即庇护九世。——編者注

会发表了称赞乌迪诺进攻罗马共和国的信一样。当国民议会批准远征罗马的拨款时，表面的自由派维克多·雨果提起了这封信的问题。秩序党在表示轻蔑和怀疑的叫声下，根本埋葬了认为波拿巴的狂妄举动可能有什么政治意义的念头。内阁阁员没有一个人出来替波拿巴应战。又一次，巴罗以他特有的空洞的热情，在讲坛上愤愤不平地讲到据他说是在总统亲信人物中进行的“可憎的阴谋”。最后，内阁从国民议会中为奥尔良公爵夫人争得了寡妇撫恤金，坚决拒绝向国民议会提出增加总统薪俸的议案。在波拿巴身上，帝位追求者和破产冒险家的身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认定自己负有使命恢复帝国，同时他又认定，法国人民负有使命替他偿清债务。

巴罗一法卢内阁是波拿巴所成立的第一个同时又是最后一个议会制内阁。所以，这个内阁的解散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随着这个内阁的解散，秩序党就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为维持议会制度所必需的支柱——对行政权力的领导。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力支配着五十万以上的官吏，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人；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重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小的生活表现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生活止；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非常的集权制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同时现实的社会机体却又是极无自动性、极其软弱、极不固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分明显，国民议会如果不简化国家管理，尽可能缩减庞大的官员，不让市民社会和舆论界创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那末它一旦失掉分配阁员位置的权限，同时也就失掉任何实际影响了。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

益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分不开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在不能把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根本割掉时，由于对它们猜疑而加以摧残和麻痹。这样，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议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相敌对的行政权力成为不可克制的权力。

新内阁叫做奥普尔内阁。这并不是说奥普尔将军得到了内阁总理的职位。自从巴罗免职时起，波拿巴甚至廢除了这个职位，因为事实上这个职位使共和国总统成为在法律上毫不足道的立宪君主，这个立宪君主没有王位和王冠，没有王笏和宝劍，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没有世襲的最高国家权位，而最坏的是没有皇室費。奥普尔内阁里只有一个人拥有議員头銜，这就是高利貸者富尔德，他是金融貴族中恶名昭彰的一个。財政部长的位置就落到他手上。只要看看巴黎交易所的行市表，就可以看出，从1849年11月1日起，法国的证券是随着波拿巴的股票的漲跌而漲跌的。这样波拿巴既在交易所中找到了同盟者，同时又以任命卡尔利埃为巴黎警察局长而把警察抓到自己手里。

可是，内阁更迭的后果，只有在事变继续发展的进程中才能显露出来。波拿巴暂时只向前进了一步，好像是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自己被抛到后面去了。他送了一份粗齒的咨文以后，接着就极为卑屈地表示听命于国民議会。每当内阁閣員们敢于怯生生地試图把他个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制定成法案的时候，他們好像只是迫

于本身地位勉强执行他們事先已确信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滑稽性的委托。每当波拿巴在內閣閣員們背后泄露出他的意图并玩弄他的 «idées napoléoniennes»²⁷ 的时候，他的內閣閣員就在国民議会的讲坛上表示不同意他的主張。看来好像他說出篡夺权位的欲望，只是为了使他的敵人們的幸灾乐禍的笑声不致沉寂下去。他扮演了一个不被賞識而被全世界当作傻瓜的天才角色。他从来还没有像这个时期这样遭到一切阶级的深刻的輕蔑。資产阶级从来还没有这样絕對地統治过，从来还没有这样高傲地夸示过自己的統治地位。

我的任务不是在这里叙述資产阶级立法活动的历史，它的立法活动在这个时期只限于制定两个法律：一个是恢复葡萄酒稅的法律，另一个是廢除无神思想的教育法。資产阶级虽使法国人在葡萄酒的消費上感到困难，同时却慷慨地用純正生活的清水款待了他們。資产阶级以葡萄酒稅宣布了旧时的可恨稅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时又力图以教育法使人民群众保存他們能够容忍这一稅制的旧时的心境。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奥尔良派，自由派資产者(这些伏尔泰主义和折衷派哲学的老信徒們)竟把指导法国人的精神的工作，委托給他們的世仇耶穌会派去担任。可是，奥尔良派和正統派在王位追求者这个問題上虽然有分歧，但是他們双方都懂得，他們的共同統治要求把两个时期的压迫手段結合起来，七月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必須用复辟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来补充和加强。

农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們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苦于粮价低落，另一方面又苦于賦稅和抵押債務日益加重，于是他們在各省开始騷动起来。他們所得到的答复是迫害学校教师，使他們服从于僧侶，迫害地方长官，使他們服从于行政官，最后是施行控制

一切人的偵探制度。在巴黎和各大城市，反动派本身具有自己时代的特征，挑衅行为多于压制。在乡村中，反动派卑鄙齷齪，瑣碎小器，可恶可厌，一句話，就是宪兵。显然，受过牧师制度熏染的三年宪兵制度，对愚昧的群众的腐蝕該是多么深。

虽然秩序党在国民議会讲坛上热情奔放，大发議論反对少数派，但是它的言詞始終是单音节的，正如基督徒只應該說“是”和“否”一样！不論是讲坛上或报刊上的言論，都很單調，和預先知道答案的謎語一样平淡无味。不管是談請願权还是葡萄酒稅，不管是談出版自由还是貿易自由，不管是談俱乐部还是市政机构，也不管是談保障人身自由还是决定国家預算，发出的口号总是一样，題目总是一个，判詞总是早已准备妥貼而且总是一成不变地說：“社会主义！”甚至資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資产阶级的教育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資产阶级的財政改革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在已有运河的地方建筑铁路也是社会主义，用木棍抵御刀劍的襲击也是社会主义。

这并不只是一句空話、一种时髦或一种党派斗争手腕。資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創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轉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創造的所有的神都离棄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謂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統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了。在这种威胁和这种侵犯中，它正确地看出了社会主义的秘密，所以它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和趋势的評价，就比所謂的社会主义自己对自己的評价更正确些，而这种所謂的社会主义因此也就不能了解，为什么資产阶级对它一味表示反对——不管它是在为

人类的痛苦感伤地哭泣，不管它是在宣扬基督的千年王国和博爱，也不管它是在用人道主义态度漫谈精神、教育和自由，或是在空泛地臆造一切阶级的协调和幸福的制度。资产阶级只是没有了解到一点：如果推论下去，那末它自己的议会制度，它的整个政治统治，现在也应该被普遍指责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了。当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还没有获得自己的纯粹的政治表现时，其他各个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它有所表现的地方，它也不能采取那种使一切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危险形式。既然资产阶级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生活表现都危害“安宁”，那末它又怎能希望在社会上层保持不安宁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个——照它的一位发言人的说法——生存在斗争中并且靠斗争生存的议会制度呢？靠辩论生存的议会制度怎能禁止辩论呢？既然这里每种利益、每种社会措施都变成一般的思想，并被当作一种思想来解释，那末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把某种利益、某种措施当作一种高出思维的东西而强使人人们把它当作信条来接受呢？发言人在讲坛上的斗争，引起了报界的低级作家的斗争；议会中的辩论会必然要由沙龙和酒馆中的辩论会来补充；议员们经常诉诸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请愿书中表示自己的真正的意见。既然议会制度将一切事情交给大多数决定，那末议会以外的大多数又怎能不想也作决定呢？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顶峰上拉提琴，那末你们又怎能因为站在下面的人们跳舞而惊奇呢？

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宣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迫使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

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應該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資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同其他阶级一样低下，个别資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的福利；要挽救它的錢包，必須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而把保护它的劍像达摩克利斯的劍一样地悬在它自己的头上。

在資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方面，国民議会表現得非常无能，例如1850年冬季开始的关于修筑巴黎—阿維尼翁铁路問題的討論，直到1851年12月2日还没有結果。只要国民議会不从事压迫，不进行反动活动，它就患了不可救药的不妊之症。

当波拿巴的内閣一部分倡议制定符合秩序党精神的法律，一部分又在加强实施这些法律时的苛刻性的时候，波拿巴本人却企图以一些幼稚荒唐的提案来博得声望，强调自己对于国民議会的敌意，并暗示有某种神秘的宝藏，只是由于环境的阻碍暂时还不能把財宝显示給法国人民。这类提案中包括了給下級軍官每天增加四个苏的津貼的建議，以及为工人創設“荣誉貸款銀行”的法案。金錢的餽贈和金錢的借貸，这就是他希图用以誘惑群众的远景。餽贈和貸款，这就是显貴的和卑賤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全部財政艺术。波拿巴所善于运用的妙訣只此而已。从来还没有一个王位追求者像他这样庸俗地利用群众的庸俗习气来进行投机勾当。

国民議会眼看着波拿巴这样明明白白地企图靠損害它的利益来博取声望，眼看着这个被債主鞭撻而又毫无值得珍惜的声誉的冒險家愈来愈可能干出某种极冒險的勾当，曾不止一次地表示狂怒。秩序党和總統之間的分歧已經带有危險性质，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又迫使總統怀着懺悔的心情重新投入秩序党的怀抱。我們指的是1850年3月10日的补缺选举。这次选举是为了填补6月

13 日事变后被监禁或驅逐出国的議員所空下来的席位的。巴黎只选了社会民主派的候选人，并且绝大部分选票都投給了参加过1848年六月起义的德弗洛特。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巴黎小资产阶级，就这样报复了1849年6月13日的失敗。看来，小资产阶级在危急关头离开战場，只是为了要在順利的情况下以更大的战斗力量和更勇敢的战斗口号重新进入战場。看来有一种情况更加重了这次选举胜利的危險性。巴黎的军队投票选举了六月起义的一个参加者来对抗波拿巴的內閣閣員拉伊特，而在各省，大部分人都投了山岳党人的票，山岳党人在这里（虽然不如在巴黎那样絕對地）也比敌人占了优势。

波拿巴突然看到自己又面对着革命了。和1849年1月29日及1849年6月13日一样，1850年3月10日他又躲到秩序党背后去了。他屈服了，他怯懦地請罪，表示决心遵照議会多数人的意旨來組織任何一个內閣，他甚至恳求奥尔良派和正統派的首領們（梯也尔、貝利耶、布洛利和摩萊），一句話，就是恳求所謂的城官們²⁸亲自掌握政权。秩序党未能利用这个千載難逢的机会。它不但沒有大胆地握手这个政权，甚至也沒有强迫波拿巴恢复他在11月1日所解散的內閣；它滿足于用自己的寬恕羞辱了波拿巴，并使巴罗什先生加入了奧普爾內閣。这个巴罗什作布尔日最高法院的檢察官时，曾疯狂地攻击过5月15日事件中的革命者和6月13日事件中的民主派，两次都指控他們危害国民議会。以后，波拿巴的任何一个內閣閣員，都沒有比巴罗什更多地侮辱过国民議会，而在1851年12月2日以后，他又得到了參議院副議長这个官高祿厚的职位。他把痰吐在革命者的湯中，为的是让波拿巴能够把它喝掉。

社会民主派似乎只是在寻找借口再度使自己的胜利成为問題，并削弱这一胜利的意义。巴黎新选出的議員之一維达尔，同时在斯特拉斯堡也当选了。他被說服放棄巴黎的委任状而接受了斯特拉斯堡的委任状。这样，民主派就沒有把自己在选举中的胜利变成最終的胜利，从而激起秩序党立刻在議会中进行斗争，它沒有迫使敌人在人民热情高昂和军队情緒良好的时机出来斗争，反而在3月和4月間用新的竞选运动把巴黎弄得疲憊不堪，使人民的激昂的感情在这一新的临时竞选把戏中消耗掉，使革命的精力滿足于宪制的成就，把革命精力浪费于細小的攻訐、空洞的宣言和运动的表面，让资产阶级有时间恢复知觉和采取措施，最后以4月补缺选举的感伤主义的注釋（欧仁·苏当选）減弱了3月选举的意义。一句話，社会民主派和3月10日开了一个愚人节的玩笑。

議会中的多数了解自己对方的弱点。秩序党的十七个城官（因为波拿巴让秩序党領導和負責攻击）制定了新选举法，法案的报告人是要求这种荣誉的福适先生。5月8日，福适提出了一个法案，其內容是要廢除普选权，并規定选举人必須在他們所在的选区内居住三年；工人在选区的居住年限应由他們的雇主作证来加以确定。

民主派在宪制选举斗争时期曾滿怀着革命的激情，当現在應該拿起武器来证明自己的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他們却以宪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扬庄严的宁靜(*calme majestueux*)和合法行为，也就是盲目地服从自封为法律的反革命势力的意志。在辯論的时候，山岳党力图羞辱秩序党，以一个遵守法制的正直庸人的冷漠态度来对抗它的革命热情，严厉責备它的革命行为从而把它置于死地。甚至新当选的議員們也极力想以自己的謹慎而有礼的举

动来向大家证明：責罵他們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把他們的当选解釋成革命的胜利，是多么地不公正。5月31日，新选举法通过了。山岳党把抗議书塞进總統的衣袋里就心滿意足了。继选举法之后又通过了一个彻底消灭革命报刊的新出版法²⁹。革命报刊遭到这种厄运是應該的。在这一摧残以后，革命最前緣的边哨就只剩下“国民报”和“新聞报”³⁰这两个資產阶级的報紙了。

我們已經看到，民主派的領袖們在3月和4月間曾竭力把巴黎人民拖入虛构的斗争，正如他們在5月8日以后竭力阻止巴黎人民进行实际的斗争一样。此外，还不应当忘記，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可是1850年5月31日的选举法根本剥夺了无产阶级参政的权利，甚至断絕了他們接近戰場的机会。这个法律使工人回复到他們在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毫无权利的地位。在这些事变的时刻，他們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民主派的領袖去掌握，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記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他們放棄了作为致胜力量的光荣，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并且表明，1848年6月的失敗使他們长期丧失了战斗能力，最近的历史进程也要撇开他們而向前发展。至于在6月13日曾大嚷大叫“只要他們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的小資產阶级民主派，現在他們却自慰說：反革命給他們的打击根本不是打击，而5月31日的法律也根本不是法律。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每个法国人都将一手拿着选票，一手拿着利劍来到投票站。他們用这样的預言来安慰自己。最后，军队为了1850年3月和4月的选举而受到上級的处罚，正如他們曾經为了1849年5月28日的选举而受到处罚一样。可是这次军队坚决地对自己說：“第三次我們再不会上革命的当了！”

1850 年 5 月 31 日的法律，是資產階級的 coup d'état [政變]。資產階級過去所有各次對革命的勝利，都只具有臨時的性質。只要現屆國民議會一退出舞台，這些勝利就成為問題了。這些勝利是以新的普選中的偶然情況為轉移的，而自从 1848 年以來，選舉的歷史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資產階級的實際權力愈強大，它對人民群眾的精神統治權力就愈弱。普選權在 3 月 10 日斷然表明反對資產階級的統治，資產階級就以取消普選權進行了報復。所以，5 月 31 日的法律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必然表現。另一方面，按憲法規定，共和國總統的當選至少要有二百萬票才算有效。如果總統候選人中沒有一個人獲得這個最低限度的票數，國民議會就有權從得票最多的三個候選人中選出一個來當總統。當制憲議會制定這個法律的時候，選民冊中共有一千萬選民。所以，按照這個法律，只要取得占選民總數五分之一的票數，總統當選就算有效了。5 月 31 日的法律至少從選民冊中勾銷了三百萬個選民，這樣就把選民人數減低到七百萬人，但是當選總統需要獲得二百萬選票的法定最低限額却依然保留着。這樣一來，法定的最低限額就從總選票的五分之一几乎提高到三分之一。換句話說，這個法律用盡一切辦法把總統選舉從人民手里暗中轉到國民議會手里。總之，秩序黨就好像是加倍巩固了自己的統治權力，因為它已經用 5 月 31 日的選舉法把國民議會議員的選舉和共和國總統的選舉轉交給社會的保守部分了。

五

革命危机刚一过去，普选权刚一废止，国民议会和波拿巴之间的斗争就重新爆发了。

宪法规定发给波拿巴的薪俸是每年六十万法郎。他就任总统后不到半年功夫，就把这个数额增加了一倍。奥迪隆·巴罗要制宪议会每年补发六十万法郎作为所谓交际费。在6月13日以后，波拿巴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要求，可是巴罗这次并没有听从。现在，在5月31日以后，波拿巴立即利用有利的时机，通过他的内阁阁员们向国民议会要求每年发给三百万法郎的文官费。长期的流浪生活使这个冒险家极为敏感，他能深知可能向资产者勒索金钱的时机。他采取了十足的欺诈手段。国民议会在他的协助和同意下污辱了人民的主权。他威胁说，如果国民议会不松开钱袋，不以每年三百万法郎来买他的沉默，他就要把国民议会的犯罪行为报告给人民。国民议会剥夺了三百万法国人的选举权，他要求把每一个在政治上被弄得毫无价值的法国人换成一个实价的法郎，总额是三百万法郎。他是由六百万人选出来的，他要求赔偿他在事后被剥夺掉的票数。国民议会的委员会拒绝了他这种厚颜无耻的要求。于是波拿巴派的报纸就来进行威胁。国民议会能不能在它根本彻底和国民群众决裂的时候又同共和国总统决裂呢？国民议会虽然否决了每年的文官费，同时却通过了一次增发二百一十六万法郎的决定。国民议会既已答应给钱，同时又以自己的烦恼表明

自己的让步是出于不得已，因而就暴露了加倍的軟弱。波拿巴为什么需要这笔款子，我們往后就可以看到。在廢除普选权后紧接着发生的令人喪气的尾声中，波拿巴对于篡夺权力的議会的口吻已經从3月和4月危机时期的恭順平和变成了挑战式的驕橫，而国民議会在这次事件后却休会三个月，从8月11日到11月11日。它在休会期間留下了一个由二十八个人組成的常任委員會，其中沒有一个波拿巴分子，但是有几个溫和的共和派。1849年的常任委員會完全是由秩序党和波拿巴分子組成的。但是，那时是秩序党以革命的經常反对者自命，現在則是議会制共和国以總統的經常反对者自命了。5月31日的法律通过后，秩序党所必須考慮的只是这个敵手了。

1850年11月国民議会复会的时候，情况是这样：看来，过去国民議会和總統之間的一些小小的冲突勢必要轉化为两个权力間的大規模的战斗，轉化为两个权力間不可避免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和1849年間一样，这次議会休会期間，秩序党又分解成了各个派別，其中每一派都忙于自己的复辟陰謀，这种陰謀因路易-菲力浦之死而更加活跃起来。正統派的国王亨利五世，甚至任命了一个組織完备的內閣駐在巴黎，其中有几个常任委員會委員参加。因此，波拿巴也有理由巡游法国各省，并按照他所幸临的每个城市的情緒，或多或少公开地吐露自己的复辟計劃，为自己張罗选票。波拿巴的这次巡游，被大型的官方報紙——“通报”³¹ 和小型的、波拿巴的私人通报捧作胜利的游行，在这次巡游期間，到处都有十二月十日会的會員們隨駕陪行。这个团体在1849年就成立了。它名义上是个慈善团体，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組成的一些秘密团体，每一个团体都由波拿巴的走狗們領導，总领导人是一个波

拿巴派的将军。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破落放荡者之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镀锡匠、叫化子，一句话，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作 *la bohème* [浪荡游民] 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十日会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这个团体的所有的成员都和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是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这就是 *sans phrase* [不加掩饰的] 波拿巴。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这种生活所演出的一切悲剧，都看作最鄙俗的喜剧，看作专以华丽的服装、词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跳舞会。例如，在进攻斯特拉斯堡时，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的角色。当他在布伦登陆时，他给几个伦敦僕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成了军队³²。在他的十二月十日会中，有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应该装作人民，正像聶克·波顿应该扮演狮子³³一样。当资产阶级毫不违反法国演剧格式的迂腐规则，十分严肃地表演最纯粹的喜剧时，当它一半被骗一半信服自己表演得庄严堂皇时，一个把喜剧仅仅看作喜剧的冒险家当然是要获得胜利的。只有当他战胜了盛装的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在拿破仑的假面具下装作真正的拿破仑以后，他才会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

成为一个再不把世界历史看作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作世界历史的认真的丑角。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厂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别动队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义一样。在他巡游期间，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上，装作迎驾的群众，并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Vive l'Empereur!》[“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当他回到巴黎时，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十二月十日会属于他，它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一切方面，他硬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都是由于情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作的一切，都不过是情势替他作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他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³⁴一流人的团体，依靠着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会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有一次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几个秩序党议员曾挨了十二月十日会会员的木棍。不仅如此，负责国民议会保卫事宜的警卫专员伊雍，曾根据一个名叫阿勒的人的口供向常任委员会报告，说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决定暗杀尚加尔涅将军和国民议会议长杜班，并且已经指定了凶手。可以想像，杜班先生该是多么惊恐。看来，议会对十二月十日会的调查，即对波拿巴秘密内幕的揭发，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在国民议会即将开会的时候，波拿巴却预有戒备地解散了自己的这个团体，不过这种解散当然只是在表面上，因为1851年末，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在一个详尽的报告书中还白费气力地劝他把十二月十日会真正解散。

当波拿巴还未能把国家军队变成十二月十日会时，十二月十日会仍然是他的私人军队。波拿巴在国民议会休会不久就在这方面作了初次的尝试，而且用的是他从国民议会手中索取来的钱。他是一个宿命论者，相信有某种最高力量是人们特别是军人所抵抗不住的。而首先被他列入这种力量的就是雪茄烟和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所以他一开始就在爱丽舍宫的大厅里用雪茄烟、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款待了军官和军士。10月3日他在圣摩尔阅兵时，又对军队采用了这种办法；10月10日他在萨托里总阅兵时，又更大规模地重复了这种办法。伯父回忆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亚洲的故事，侄儿就回忆巴克斯在同一地方征伐的故事。不错，亚历山大大帝是半神，而巴克斯却是真神，并且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庇护神。

10月3日检阅后，常任委员会曾把陆军部长奥普尔召来质问。后者保证这类侵犯纪律的事情不再发生。大家知道，波拿巴怎样在10月10日履行了奥普尔的诺言。这两次阅兵都是由巴黎军队总司令尚加尔涅担任指挥的。这个尚加尔涅既是常任委员会的委员，又是国民自卫军的司令官；既是1月29日和6月13日的“救星”，又是“社会中坚”；既是秩序党的总统候选人，又是两个王朝的意中的蒙克；他以前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陆军部长的部属，一向公开嘲笑共和国宪法，以模棱两可的高傲的庇护态度追逐着波拿巴。现在他却热烈地拥护军纪，反对陆军部长；拥护宪法，反对波拿巴了。当10月10日有一部分骑兵高呼“Vive Napoléon! Vivent les saucissons!”[“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时，尚加尔涅竟安排得至少是他的朋友诺马耶率领去受检阅的步兵严守沉默。在波拿巴的慇恿下，陆军部长为了惩罚诺马耶将军，以任命他为第十

四和第十五师团的司令官为借口，解除了他在巴黎的职务。波拿巴拒絕調換职务，因而被迫辞职。尚加尔涅于11月2日发布命令，禁止军队在軍伍中呼喊任何政治口号和进行示威。爱丽舍方面的報紙³⁵攻击尚加尔涅；秩序党的報紙攻击波拿巴；常任委員会接連不断地召开秘密會議，会上一再提議宣布祖国处于危急状态；军队好像已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有两个敌对的參謀部，一个在波拿巴的官邸爱丽舍宮，另一个在尚加尔涅的官邸土伊勒里宮。国民議会的开会看来是不免要发出战斗的信号了。法国公众对波拿巴和尚加尔涅間这次糾紛的評判，和一位英國記者对这种情况的諷論相同，这位記者写道：

“法国的政治女僕們正在用旧扫帚扫除革命的灼热熔岩，而她們在这样做的时候又互相爭吵得不可开交。”

这时，波拿巴急忙免除了陆军部长奥普尔的职务，随即把他派到阿尔及利亚去，任命施拉姆將軍继任陆军部长。11月12日波拿巴向国民議会送去了一篇美国式的冗长咨文，其中充滿了瑣事，渗透着秩序的臭味，渴望調和，表示服从宪法，談論到所有一切，只是沒有讲到当前的 *questions brûlantes* [紧急問題]。他好像是順便指出，根据宪法的真义，军队的指揮权完全屬於总统。这篇咨文是以下面一段极其庄严的詞句結尾的：

“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 我一个人身受誓言約束，我将謹守这个誓言所給我划定的狹隘界限…… 至于我个人，我是人民选出的，我的权力完全是人民賦予的，我将永远服从人民的合法表示的意志。如果你们在本届会期中决定要修正宪法，制宪議会就会調整行政权力的地位。否则人民将于1852年庄严地宣布自己的决定。可是不論将来的决定如何，我們总應該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了解：一个偉大民族的命运永远不会由热情、意外事故或暴力来主宰…… 我首先注意的問題不是誰将在1852年治理法国，而是要运用

我所能支配的时间使这个过渡时期不发生风波和乱子。我对诸位是开诚布公的。望你们以信任来回答我的诚意，以襄助来回答我的善念，其余的一切上帝会来照顾。”

资产阶级惯用的有礼貌的、伪善而温和的、庸俗慈善的腔调，在十二月十日会的专制魔王兼圣摩尔和萨托里的野餐英雄的口中，暴露了它那最深长的含义。

关于这种内心剖白应该受到什么样的信任的问题，秩序党的城官们一刻也没有弄错。誓言他们早已听厌了，他们自己的人们中间就有许多政治上违背誓言的老手和巧匠；不过关于军队的那一段话，他们倒没有听漏。他们愤慨地发觉：这个咨文非常烦琐地列举了最近颁布的各种法律，但是故意不提最重要的法律——选举法；不仅如此，在拒绝修改宪法时，这个咨文把1852年的总统选举委诸人民。选举法是拴在秩序党脚上的沉重贋物，妨碍他们行动，当然更妨碍他们冲击！此外，波拿巴以正式解散十二月十日会和免除奥普尔的陆军部长职务的手法，亲手把替罪的羔羊献到祖国的祭坛上。他把预期发生冲突的最尖锐的争端排除了。最后，秩序党自己也胆怯地竭力回避、缓和并抹杀和行政权力发生的决定性的冲突。由于害怕失去在和革命进行斗争中所获得的一切，它让敌手攫取了它所获得的果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秩序党从2月^①起就开始对革命这样叫喊；现在波拿巴在他的咨文中又对秩序党这样叫喊。“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波拿巴采取了图谋篡夺权位的行为，但是当秩序党因为这种行为而吵吵嚷嚷并且神经过敏地加以解释的时候，它就成了造成“不安宁”的罪人。

① 1848年2月。——编者注

只要沒有人談到薩托里的腊腸，这腊腸是根本不会說話的。“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波拿巴要求让他安安靜靜地干他的事情，而議会党却已經被双重的恐惧所麻痹：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宁状态，二怕自己在本阶级即資产阶级眼中成为造成不安宁的罪人。既然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秩序党也就不敢用“战争”来回答波拿巴咨文中的“和平”了。一般人曾期待在国民議会开会时必将大吵大鬧，結果是大失所望。反对派議員要求常任委員会交出它关于十月事件的記錄，但这个要求被多数否決了。国民議会根本規避一切可能激动人心的辯論。国民議会在 1850 年 11 月和 12 月的工作是沒有什么意义的。

直到 12 月底，才开始发生了一些关于議会个别特权問題的小冲突。自从資产阶级以廢止普选权暂时避开了阶级斗争的时候起，运动范围就縮小了，变成专为两个权力間的特权問題发生的小的口角了。

有一位議員，名叫摩干，因負債被法庭判罪。司法部长魯艾在回答法院院长的詢問时宣称，应当不再拘什么仪式徑直下令把負債者拘捕起来。于是摩干就被投入債務监狱。国民議会知道这种破坏議員的不可侵犯权的消息时，大为憤懣。它不仅决定立即釋放被捕者，而且当晚就通过自己的法警用强力把他从克利希监狱里放出来了。可是，在另一方面，为了要证明自己信仰私有制的神圣性，并且为了将来在必要时能够把討厌的山岳党人安置到現成的地方去，国民議会又宣布說：在事先取得它的同意时，拘捕負債的議員是容許的。国民議会忘記宣布總統也可以因負債被捕入獄。国民議会把自己議員的不可侵犯权的最后一點影子都消灭无余了。

上面已經讲过，警卫专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勒的人的供詞，告发了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阴谋暗杀杜班和尙加尔涅两人的行为。因此，議会总务官在第一次會議上就提議成立一个特別議会警察队，由国民議会本身的預算中的經費維持，完全不受警察局长管轄。內务部长巴罗什提出了抗議，說这是一种侵害他的职权的行为。結果双方达成了可怜的妥协，規定議会警卫专员应由議会預算中的經費維持并由議会总务官任免，但是事先必須取得內务部长的同意。这时，政府已对阿勒提起訴訟，因而很容易就把阿勒的供詞宣布为凭空捏造，檢察官的发言把杜班、尙加尔涅、伊雍和整个国民議会嘲笑了一頓。然后，12月29日，巴罗什部长又写信給杜班，要求把伊雍免职。国民議会常任委員会决定伊雍留任原职，可是国民議会被自己在摩干案件中所采取的暴力行为所吓倒，它习惯于在每次給行政权力打击后受到它的两个打击，因此沒有批准这个决定。国民議会为酬答伊雍的忠誠尽职而免了伊雍的职，因而剥夺了自己所享有的議会特权，但这种特权对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当时它所要对付的那个人，不是一个夜間决定白天要干什么的人，而是一个白天作决定却在夜間采取行动的人。

我們已經看到，国民議会在11月和12月間，总是极力避免和拒絕在重大的、迫切的問題上和行政权力进行斗争。現在我們却看到，它不得不为了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投入战斗。在处理摩干案件时，它原則上已經允許逮捕負債的議員，不过又保证自己能够把这个原則只运用于可恶的議員身上，为了这种可耻的特权和司法部长发生了爭执。国民議会沒有利用关于有人准备謀杀杜班和尙加尔涅两人的消息要求追查十二月十日会的活动，并在法国和欧洲面前彻底揭穿波拿巴，使大家都能明白看出他是巴黎流氓无产

階級的首領，它竟把衝突歸結為在警衛專員應由誰任免的問題上跟內務長的爭吵。這樣，我們就看到，秩序黨在這個時期內始終都因自己的模棱兩可的態度而不得不把自己反對行政權力的鬥爭變成關於權限問題的很小的糾紛，變成吹毛求疵、無謂爭訟以及關於界限問題的爭論等空襲，把一些空洞的形式問題變成了自己的活動的內容。當鬥爭具有原則意義，當行政權力真正名譽扫地，當國民議會的事業將成為國民的事業的時候，秩序黨却不敢戰鬥，因為它如果這樣做，就會對全國發出一種發動的信號，而發動國民正是它最害怕的事情。因此，在這種場合，它總是否決山岳黨的提案而轉入日常議程。當秩序黨已經放棄了大規模的鬥爭之後，行政權力就靜待时机，以便有可能當鬥爭只具有可說是議會性的局部的興趣時，借一個很小的无关緊要的理由重新開始這種鬥爭。那時秩序黨就發泄出滿懷的憤怒，那時它就拉開后台的布幕，揭开總統的假面具，宣布共和國處境危急，然而那時它的熱情令人感到荒唐，鬥爭的理由是一種虛偽的口實或根本不值得鬥爭的東西。議會的風暴原來不過是一杯水中的風暴，鬥爭不過是陰謀，衝突不過是吵架。各革命階級都幸災樂禍地觀望着國民議會受屈辱，因為他們對國民議會的議會特權表示關心，正如國民議會對社會自由表示關心一樣；同時，議會外的資產階級却不了解，為什麼議會內的資產階級居然把時間浪費在這樣瑣碎的糾紛上，為什麼它竟這樣無聊地跟總統進行競爭，從而危害安寧。當大家都在等候戰爭的時候進行媾和，而當大家都以為和約已經締結的時候卻又開始進攻，這種策略把它弄迷糊了。

12月20日，巴斯噶·杜普拉就發行金條彩票一事向內務長提出質問。這彩票是“來自愛麗舍園的女兒”³⁶。波拿巴和他的親

信把她献給人世，而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則把她置于自己的正式保护之下，虽然法国的法律除了以救济为目的的彩票外是禁止发行任何其他彩票的。彩票发行了七百万張，每張一法郎，而所得純利據說是用来遣送巴黎的游民到加利福尼亞去。一方面是为了用黃金梦来排除巴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梦想，用可望中头彩的誘人幻景来驅除空論式的劳动权。自然，巴黎的工人們沒有认出加利福尼亞的耀眼的金条就是从他們口袋里騙去的无光彩的法郎。无论如何，这种彩票不过是一种騙局而已。妄想不离开巴黎就能发现加利福尼亞金矿的游民，正是波拿巴本人和他那些負債累累的侍从。国民議会同意給他的三百万法郎已經用光，无论如何总得重新填滿空虛的錢庫。波拿巴为建立所謂的 *cités ouvrières* [工人村]曾向全国募集捐款，并且他自己在认捐名册上第一个认捐了一大笔款子，但他只是徒劳了一番。冷酷的資产者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等待他付出认捐的款子；而这笔款子自然是沒有付出，于是利用社会主义空中樓閣进行的投机把戏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金条的成效較大。波拿巴和他的同謀者并不滿足于把七百万法郎中扣除奖金以后的一部分純收益装进自己的腰包，他們还制造了大批假彩票，同一个号码的彩票发出了十張、十五張以至二十張，——这真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金融手段呵！这里，国民議会所碰到的不是名义上的共和国总统，而是真正的、活生生的波拿巴。这里，国民議会可以在他犯罪——不是違反宪法，而是違反 *Code pénal* [刑法典] ——的地点把他当场捉住。如果說国民議会以轉入日常議程回答了杜普拉的质問，那末，它这样做不只是因为日拉丹提議要国民議会宣布自己“滿意”于提醒秩序党人想起他們自己的一貫的貪污行为。資产者，尤其是被提升成国家人物的資产者，总是用

理論上的浮夸来弥补自己的實踐上的卑下。資產者身为国家人物时，也和同他相对立的国家权力一样，就儼然成为至高无上之物，因而对他作斗争时，也只能采取高尚的庄严的方式。

波拿巴是一个浪蕩人，是一个驕橫的流氓无产者，他比資產阶级的騙子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現在，在国民議会亲手帮助他順利地走过了軍人宴会、閱兵、十二月十日会以及違犯 *Code pénal* [刑法典]等处很容易滑倒的地点以后，他已经看到，他可以由伪装的防御轉为进攻的时刻已經到了。当时司法部长、陸軍部长、海軍部长和財政部长所遭到的那些小小的失敗，即国民議会借以表示它的嘮叨不滿的失敗，很少使波拿巴感到不安。他不仅阻止了部长們辞职，从而阻止了承认行政权力服从議会。他現在已經能完成他在国民議会休會期間就已經开始做的事情，即軍权和議会分立的事情：他把尚加爾涅免职了。

爱丽舍方面的一家報紙发表了一个 5 月間似乎是向第一师团頒发的命令（因而是出自尚加爾涅的命令），劝告軍官們在叛乱时不要寬容自己队伍中的叛徒，要立刻将他們枪毙，并且不要按国民議会的要求派遣军队。1851 年 1 月 3 日，內閣因这一命令受到了質問。为了調查这一事件，內閣起初要求的限期是三个月，继則一星期，最后仅仅是二十四小时。国民議会要求立即予以解釋。尚加爾涅站起来声明說：这种命令从未下过。他并且补充說：他随时都准备执行国民議会的要求；遇有冲突发生时，国民議会可以信赖他。国民議会以狂热的鼓掌欢迎他的声明，并对他投了信任票。国民議会既委身于一个將軍的私人保护之下，也就是放棄了权力，宣告自己的軟弱和军队的万能；但是这位將軍弄錯了，因为他居然想把他从波拿巴那里暂时領用的权力交付給国民議会去反对同一

个波拿巴，并且盼望从这个議會，从他这个需要保护的被托管者获得保护。可是尙加爾涅相信資產階級在 1849 年 1 月 29 日賦予他的那种神秘力量。他以为自己是和其他两个国家权力相鼎立的第三个权力。他所遭遇到的命运，也和当代其他的英雄，更正确些說，和当代的圣者們所遭遇到的命运一样，这些人物的偉大只在于他們的党派故意替他們宣揚，而到局势要求他們創造奇迹时，他們就显得平庸无奇了。一般說来，不信神是这些假英雄和真圣者的死敌。因此他們往往对那些冷酷无情的諷刺者和譏笑者表示高尚的道义的憤懣。

当晚，內閣閣員們被召請到愛丽舍宮去。波拿巴坚持要撤換尙加爾涅，五个閣員拒絕署名。“通报”宣布內閣危机，而秩序党的報紙則以組織由尙加爾涅指揮的議會軍隊相威胁。根据宪法，秩序党是有权这样作的。它只要把尙加爾涅选为國民議會議長，并調來任何数量的軍队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就够了。由于尙加爾涅实际上还統率着軍队和巴黎國民自卫軍，并且正等待和軍队一起被召去援救國民議會，所以秩序党是可以更加放心地这样做的。波拿巴派的報紙甚至还不敢否认國民議會直接調動軍隊的权利，提出这种法律上的問題在当前局势下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当时軍队将听从國民議會調遣，这是十分清楚的，要知道，波拿巴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在巴黎找到两位將軍（巴拉蓋·狄利埃和圣让·丹热利）願意在把尙加爾涅撤职的命令上签名。但是秩序党本身是否能在自己的队伍中和議會里找到通过这种决定所必需的票数，就很成問題了，要知道，过了一个星期就有二百八十六个議員脱离了秩序党，而且山岳党甚至在 1851 年 12 月，在最后的决定性的时刻还否决了这样的提議。不过，城官們这时也許还能发

动他們黨內的群众去建立丰功偉績，即藏身于枪林之后，并利用投到它陣營中的军队的帮助。可是，城官老爷們并没有这样作，1月6日晚上他們到爱丽舍宮去，希望用外交手段和論据規劝波拿巴放棄把尙加爾涅撤职的决定。劝誰就是认誰作主。波拿巴由于城官們的这种企图而增加了勇气，1月12日他任命了新內閣，旧內閣的首領富尔德和巴罗什两人繼續留任。圣让·丹热利当了陆军部长。“通报”刊載了把尙加爾涅撤职的命令，他的职权划分給指揮第一师团的巴拉盖·狄利埃和指揮国民自卫軍的佩罗了。“社会中坚”退职了，这一事实虽然并没有使一块瓦片从屋頂上掉下來，但是使交易所的股票牌价上漲了。

秩序党既然推开了由尙加爾涅作代表表示願意听它指揮的军队，因而把这个军队永不复返地让給了总统，这就表明資产阶级已經丧失了統治的能力。議会內閣已經不存在了。秩序党現在既已丧失了控制军队和国民自卫軍的权力，那末它还剩下什么强制手段来同时保持議会用以統治人民的篡夺来的权力和議会用以防止总统侵犯的宪法上的权力呢？什么也沒有了。它現在只好求助于一些无力的原則，这些原則就連它自己也經常看作只是責成第三者遵守而使自己能更加从容行动的一般規則。我們所研究的时期，即秩序党和行政权斗争的时期的前一部分，就以尙加爾涅退职和軍权落入波拿巴之手而結束。現在，两个权力間的战争已經正式宣布并且已在公开进行，不过是在秩序党既失去武器又失去士兵以后罢了。国民議会已經沒有內閣，沒有军队，沒有人民，沒有社会輿論支持，从5月31日通过选举法起就不再是具有主权的国民的代表者了，它沒有眼睛，沒有耳朵，沒有牙齿，它一无所有，逐渐变成了一个旧法国的議会³⁷，它让政府去行动，自己則滿足于 post

festum [在事后]发出唠叨的抗议。

秩序党以狂怒迎接了新的内閣。贝多将军提醒大家记住常任委员会在议会休会期间的温和态度，记住它由于过分慎重而拒绝把自己的议事记录公布出来。这时内务部长自己也坚持公布这些记录，因为这些记录现在当然已像死水一样没有任何味道，它暴露不出任何新的事实，对于厌倦的公众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了。根据雷穆扎的建议，国民议会退回到自己的办公厅，任命了一个“非常措施委员会”。巴黎不越出自己平常生活的常轨一步，尤其是因为这时贸易繁荣，工业企业照常工作，粮价低廉，食品储备丰富，储蓄银行每天都收到新存款。议会所喧嚷的所谓“非常措施”，不过是在1月18日通过了对内閣的不信任案罢了，而关于尚加尔涅将军连提都沒有提到。秩序党不得不这样来规定自己的不信任案，是为了保证自己取得共和党人的票数，因为在内閣的一切措施中共和党人只赞成尚加尔涅免职一项，而秩序党实际上也不能非难其余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是它自己迫使内閣采取的。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以四百一十五票对二百八十六票通过，就是說，只是由于极端派的正統派和奥尔良派同純粹共和党人和山岳党人的联合才得以通过。这就证明，秩序党不只失去了内閣，不只失去了军队，而且在自己和波拿巴的冲突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由于热狂地倾向妥协，由于害怕斗争，由于软弱，由于眷恋亲切的国家薪俸，由于指望获得阁员的空缺（如奥迪隆·巴罗），由于那种經常使平庸的资产者为某种个人动机而牺牲本阶级的总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义，一部分议员已經从秩序党阵营中开了小差。波拿巴派的议员们从最初起就只是在对革命进行斗争时才依附于秩序党。天主教党的首領蒙塔郎贝尔在那时已經把他

个人的势力投到波拿巴方面，因为他已不相信議会党的生命力了。最后，这个党的首領們，奧爾良派的梯也爾和正統派的貝利耶，不得不公开宣称自己是共和派，不得不承认說，虽然他們的心是保皇派，而头却是共和派，議会制共和国是整个資产阶级实行統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一句話，他們不得不在資产阶级眼前把他們在議会背后繼續努力从事的复辟計謀咒罵为危險而无謂的阴谋。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是对內閣的打击，而不是对總統的打击。可是撤換尚加爾涅的并不是內閣，而是總統。秩序党不应当向波拿巴本人問罪嗎？不应当以他的复辟欲望作为罪名嗎？可是，这种复辟欲望只不过是补充了秩序党自己的复辟欲望罢了。不应当以他在閱兵和十二月十日会中的阴谋活动作为罪名嗎？可是秩序党早已把这些問題埋葬在一堆日常議程事項下面了。不应当以他撤換了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英雄，即撤換了1850年5月曾威胁要在有叛乱发生时就四处放火燒光巴黎的那个人作为罪名嗎？可是秩序党的山岳党同盟者和卡芬雅克甚至不让它对倒台的“社会中坚”正式表示同情。秩序党自己不能否认總統拥有由宪法賦予他的撤換將軍的权力。秩序党之所以气憤，只是因为總統居然把自己由宪法賦予的权力当作反对議会的手段。可是，秩序党自己岂不是也不断地（特别是在廢除普选权时）把它的議会特权当作違反宪法的手段嗎？因此，秩序党只好严格地把自己管束在議会范围以内。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議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記憶，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这种議会迷才可以說明，为什么秩序党在它已亲手消灭了議会勢力的一切条件并在它反对其他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消灭了这些条件

之后，仍然把它的議会胜利看作胜利，并且以为打击了总统的內閣閣員也就是打击了总统本人。这样，秩序党只是让总统又得到一次机会在全国面前重新凌辱国民議会罢了。1月20日，“通报”报道說，內閣全体辞职已被批准。波拿巴以議会里已經沒有一个党派占居多数（这点已由1月18日的投票，即山岳党和保皇党联合产生的果实所证明），而新的多数又尙待形成作为借口，任命了一个所謂的过渡內閣，其中沒有一个人是議會議員，全都是些毫不知名的和微不足道的人物，这是个純粹由一些听差和司书組成的內閣。秩序党現在可以把自己的精力花費在跟这些傀儡打交道上面了；而行政权力則不再认为自己在国民議会中要有什么认真的发言人了。波拿巴的內閣閣員愈是成为單純的哑配角，波拿巴就愈是明显地把全部行政权力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愈容易利用行政权力来达到个人目的。

为了报复，秩序党和山岳党联合在一起否決了給予总统一百八十万法郎补助金的提案，这个提案是由十二月十日会的首領命令他的听差閣員們提出来的。这一次，問題是由不过一百零二票的多數投票决定的，由此可见，秩序党从1月18日以来又丧失了二十七票；它的解体又进了一步。同时，为了使人不致对它和山岳党联合的用意发生絲毫怀疑，它甚至不願对一百八十九名山岳党人所署名提出的关于大赦政治犯的議案展开討論。只要那个叫做伐伊斯的內务部长出来声明說，安宁只是表面的安宁，有人在加紧进行秘密鼓动，到处都有人組織秘密团体，民主報紙又准备重新出版，从各省傳来不利的消息，日内瓦的流亡者正在主持一个通过里昂遍及法国南部全境的阴谋活动，法国处于工商业危机的前夜，魯貝市的厂主們縮短了工作时间，貝耳島³⁸的囚犯已經騷动起

来——只要伐伊斯这么一个人喚來紅色怪影，秩序党不經討論就立刻否決了这个提案，而这个提案将使国民議会获得极大的声望，并迫使波拿巴重新投入它的怀抱。秩序党本来不应当被行政权力所描繪的新騷动的远景吓住，而应当让阶级斗争有些活动余地，以便把行政权力控制在从属于自己的地位。可是，秩序党沒有感觉到自己有能力担负这种玩火的任务。

可是，所謂的过渡內閣却一直勉强維持到4月中旬。波拿巴不断地以組織新內閣的把戏来疲劳和愚弄国民議会。他时而表示要組織一个有拉馬丁和比約参加的共和党內閣，时而表示要組織不免要有奥迪隆·巴罗（凡是需要有个易于愚弄的蠢才时他就一定要出現）参加的議会內閣；时而又表示要組織一个有瓦提梅尼爾和貝諾瓦·达济参加的正統派內閣，时而又表示要組織一个有馬尔維爾参加的奥尔良派內閣。波拿巴用这种方法挑撥秩序党各派互相攻訐，并以共和党內閣的出現以及因此必然会使普选权恢复的远景来恫吓整个秩序党，同时他又竭力让資产阶级相信，他組織議会內閣的真誠努力总是遭到保皇派集团的不調和态度的打击。而資产阶级呢，日益逼近的普遍商业危机愈是給社会主义在城市中招募信徒，而低落得招致破产的粮价愈是給社会主义在农村中招募信徒，它就愈加响亮地要求“强有力的政府”，愈加认为使法国陷于“沒有行政”的状态是不可寬恕的。商业蕭条日益加重，失业者显著增多，巴黎至少有一万工人沒有飯吃，在卢昂、牟尔豪森^①、里昂、魯貝、土哥英、圣亚田、埃尔伯夫等地，无数的工厂停了工。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就敢于在4月11日恢复了1月18日的內

① 即牟罗茲。——編者注

閣，除了把魯艾、富爾德、巴羅什及其他先生們保留不動而外，還添進了萊昂·福適先生，這個福適先生曾因散發偽造的電訊而被制憲議會在最後幾天一致（除五個兼任內閣閣員的議員外）投了不信任票。這樣，國民議會在1月18日取得了對內閣的勝利而且三個月中和波拿巴進行鬥爭，只不過是為了在4月11日讓富爾德和巴羅什能夠把清教徒福適當作第三者接受到自己的內閣同盟中去而已。

1849年11月，波拿巴滿足于非議會的內閣，1851年1月他滿足于超議會的內閣，而到4月11日，他已經覺得有充分的力量來組織一個反議會的內閣了，這一個內閣把兩個議會——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即共和派議會和保皇派議會所表示的不信任協調地結合在自己身上。內閣的這種演變，是測定議會生命體溫下降的溫度計。這種體溫到4月底已經降得非常之低，甚至培爾西尼能夠在私人談話中建議尚加爾涅投到總統方面去。他向尚加爾涅保證：波拿巴認為國民議會的勢力已經徹底消滅，並且已經擬定了預備在coup d'état〔政變〕後發表的宣言，這個coup d'état是已經經過了深思熟慮，只是由於偶然的原因才又延遲下來的。尚加爾涅把这个死刑的判決告訴了秩序黨的首領們。但是誰會相信臭蟲咬人能致人於死命呢？議會雖然已經虛弱無力，完全瓦解，奄奄一息，但是它畢竟還不能使自己把它和十二月十日會的小丑一般的頭子的決鬥看作一種不同於和臭蟲的決鬥。然而波拿巴像阿革西拉烏斯回答國王亞奇斯那樣回答了秩序黨：“你把我看作螻蟻，但是總有一天我會成為獅子的”³⁹。

六

秩序党在徒劳无益地图保持軍权和夺回已經丧失的对于行政权力的最高領導权时，不得不去跟山岳党和純粹共和党人进行联合，这就确凿地证明，秩序党已經失去了独立的議会多数。仅仅是日历的力量、时钟的指針，在5月28日发出了秩序党彻底瓦解的信号。5月28日是国民議会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的开始。国民議会現在必須解决一个問題：原封不动地保存宪法呢，还是把它加以修改。但是，修改宪法就不只是要在資产阶级統治和小資产阶级民主派統治之間，在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无政府状态之間，在議会制共和国和波拿巴之間进行选择，而且是要在奥尔良王朝和波旁王朝之間进行选择！这样，在議会內部就出現了一个引起爭吵的原因，秩序党内利益彼此矛盾的各个敌对派別将圍繞着它展开公开的斗争。秩序党是各种不同社会成分的結合体。修改宪法的問題造成了一种政治热度，它使这个結合体重又分解为它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

波拿巴派关心修改宪法的原因很简单。他們首先想廢除禁止再度选举波拿巴和延长他的权力期限的第45条。共和派的立場也很简单。他們无条件地反对任何修改，认为修改宪法是反对共和国的周密的阴谋。既然他們在国民議会中拥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依照宪法又必須要有四分之三的票数贊成才能合法地决定修改宪法和召集修改宪法的专门會議，所以他們只要計算一下

自己的票数，就可相信自己必获胜利了。他們当时确实是相信自己一定要胜利的。

和这些明显的立場相反，秩序党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如果它拒絕修改宪法，它就会使現存的制度受到威胁，因为这样就会使波拿巴只有使用暴力一个出路，并且会使法国在 1852 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这个决定时刻听任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摆布，那时，總統是失去了权力的總統，議会是早已沒有权力的議会，人民則是企图重新爭得权力的人民。如果它按照宪法途徑投票支持修改宪法，那末它知道它的表决是枉然的，因为按照宪法規定，它的表决一定会被共和派的否決所推翻。如果它違背宪法而宣布說只要有简单多数通过就够了，那末它就只有在自己完全服从行政权力的条件下才能希望制服革命；这样它就把宪法、宪法的修改和它本身一并交给波拿巴掌握了。为延长总统权力而作的局部的修改，将为波拿巴帝制主义的篡夺权力开辟道路。縮短共和国寿命而作的全面的修改，又必然会引起各个王朝的要求之間的冲突，因为波旁王朝复辟的条件和奥尔良王朝复辟的条件不仅各不相同，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議会制共和国已不仅是法国資产阶级中的两派（正統派与奥尔良派，即大地产与工业）能够平分秋色地进行統治的中立地盤。它并且是他們共同进行統治的必要条件，是它們的共同阶级利益借以支配資产阶级各派的要求和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唯一的国家形式。作为保皇派，他們又重新陷入他們旧有的对抗状态，卷入地产和金錢爭夺霸权的斗争，而这种对抗状态的最高表現，这种对抗状态的化身，就是他們各自的国王，他們各自的王朝。正因为如此，所以秩序党总是反对波旁王族返国。

奧爾良派的議員克雷通，在1849年、1850年和1851年曾周期地建議廢除放逐王族的法令。議會也按同樣的周期表演了保皇派集會頑強地阻擋其被逐國王返國的場面。理查三世在殺死亨利六世以前曾對他說，他太好了，這個全世容納不了他，他的位置在天上。保皇派認為法國太壞了，不能把被放逐的國王歸還給它。情勢迫使他們成為共和派並屢次批准把國王逐出法國的人民的決定。

修改憲法（而這個問題由情勢所迫又非討論不可）不僅會使共和國成為問題，而且會使資產階級兩派的共同統治成為問題；不僅會使君主國有恢復的可能，而且會復活曾在君主國中輪流占有特權地位的那些利益間的競爭，復活資產階級兩派間爭奪霸權的鬥爭。秩序黨的外交家們希望以兩個王朝的結合，即以各個保皇派和它們的王室的所謂融合來中止這一鬥爭。復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真正融合便是議會制共和國，在這一共和國中，奧爾良派和正統派雙方的色彩都脫落了，各種形態的資產者都消溶為一般的資產者，消溶為資產者這個類屬了。現在奧爾良派應當變成正統派，正統派應當變成奧爾良派。體現著他們的互相对抗的君主國，應當成為他們彼此統一的化身；他們互相排斥的派別利益的表現，應當成為他們的共同的階級利益的表現；君主國應當完成只有把兩個君主國都廢除了的共和國才能完成和已經完成的任務。這就是秩序黨的術士們絞盡腦汁製造出來的哲人石。彷彿正統派的君主國可能在什麼時候變成工業資產者的君主國，或是資產階級的君主國可能在什麼時候變成世襲土地貴族的君主國一樣。彷彿地產和工業能够在一頂王冠下面和平共居一樣，可是王冠只能落到一個人頭上——不是落到哥哥頭上，就是落到弟弟頭上。彷彿在地產

还没有决心自动变成工业财产以前，工业可以和地产和解一样。如果亨利五世明天逝世，巴黎伯爵仍然不会成为正统派的国王，除非他不再作奥尔良派的国王。但是，从事融合的哲人随着宪法修改问题被提到首位而喊得愈益响亮起来，把“国民议会报”变成自己的正式的机关日报，并且直到现在（1852年2月）还在努力活动——这些哲人认为一切困难都是由于两个王朝派的对抗和竞争。于是，想使奥尔良王室和亨利五世和解的企图，从路易-菲力浦逝世时就已经开始，但这种企图也像只是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在会议休息时、在后台进行的其他一切王朝阴谋一样，与其说是郑重的事情，不如说是对旧日迷信的卖弄风情，这种企图现在已经变成一种隆重的表演，秩序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把它当作票友戏演出，而是把它当作公开上演的戏了。信使不断从巴黎奔到威尼斯⁴⁰，再从威尼斯奔到克勒蒙特，又从克勒蒙特奔回巴黎。尚博尔伯爵发表了一个宣言，他在这个宣言中“靠他全家人的支持”，宣布“国民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复辟。奥尔良派的萨尔万迪跪倒在亨利五世脚下，正统派的首领贝利耶、贝诺瓦·达济和圣蒲利斯特等跑到克勒蒙特去劝说奥尔良王室，但是徒劳无功。主张融合者在太晚的时候才觉察到，资产阶级两派的利益虽然在家族利益即两个王室的利益的形态中日益尖锐，但是它们并不会因此更少地互相排斥，也不会因此更多地互相谦让。假定亨利五世承认巴黎伯爵是他的继承人（这是主张融合者在最好的場合所能指望的唯一成就），那末奥尔良王室除了因亨利五世没有后嗣本来就一定能够获得的东西外，并不会得到别的权利，可是它会因此丧失它从七月革命获得的一切权利。奥尔良王室将放棄自己旧日的要求，放棄它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斗争中从波旁王室长系手里夺得的一切权利，它

将要为了宗族的特权而放棄自己的历史特权，即現代君主国的特权。所以，融合无非就是奧尔良王室的自願退让，为了正統派放棄自己的权利，憊悔地从一种国教后退到另一种国教，从新教后退到天主教。这种后退可能給予奧尔良王室的甚至不是它所失去的王位，而只是它誕生时所占据的王位的一个阶梯。旧日的奧尔良派閣員、基佐、杜沙特尔等人，也赶快跑到克勒蒙特那里去即早筹划融合事业，实际上他們只是表現了七月革命后的醉后的头痛，表现了对資产阶级王权和資产者的王权的失望，表现了对正統派的迷信，把它作为防止无政府状态的最后的护身符。他們自命为奧尔良王室和波旁王室之間的調停者，事实上他們只不过是奧尔良派的变节分子，而茹安維尔亲王就是把他們当作这种人来看待的。然而，奧尔良派富有生命力的、好战的那部分人，如梯也尔、巴茲等，却因此更容易使路易-菲力浦家族确信，既然君主制的任何直接的复辟都要以两个王朝的融合为前提，而任何这样的融合又都要以奧尔良王室放棄自己的权利为前提，那末，暫且承认共和国，等到事变允許把總統的安乐椅变成王位时再說，这样作是和他們家族的傳統完全相适合的。起初有人散布謠言說茹安維尔要当共和国總統的候选人，公众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过了几个月，到九月間，在宪法修改案已被否决以后，这个候选人就被公开宣布了。

这样一来，保皇派要奧尔良派和正統派融合的企图，不仅遭到了失敗，而且还破坏了他們在議会中的融合，破坏了把他們联合起来的共和国形式，把秩序党又分解成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但是，克勒蒙特和威尼斯之間愈是疏远，它們之間的关系愈是近于決裂，有利于茹安維尔的煽动愈是加紧，波拿巴的內閣閣員福适和正統派之間的談判，也就愈加热烈，愈加认真了。

秩序党的解体还不止于它分解成各个基本构成部分。这两个巨大派别中的每一派，又都继续分解下去。看来，好像先前在两大营垒中每一个营垒（不論是正統派或奧爾良派）內部曾經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一切旧有色彩，如同干纖毛虫碰到了水一样，又都重新活起来了。看来，他們又重新获得了充分的生命力，能够形成具有互相对立的独立利益的各个派別了。正統派在梦想他們又回到土伊勒里宮和馬松閣之間进行爭吵、維萊爾和波林尼雅克之間进行爭吵的时代⁴¹。奧爾良派又重新經历了基佐、摩萊、布洛利、梯也尔和奧迪隆·巴罗之間比武的黃金时代。

秩序党中有一部分人贊成修改宪法，可是对于修改的范围，他們的意見并不一致，在这一部分人中，有貝利耶和法卢一方所領導和拉罗什雅克兰一方所領導的正統派，有摩萊、布洛利、蒙塔郎貝爾和奧迪隆·巴罗領導的那些在斗争中疲倦了的奧爾良派；这一部分人和波拿巴派方面的議員一致提出了如下一个含义广泛而不明确的建議：

“下面署名的議員建議把宪法加以修改，目的在于把完全实现国民主权的可能性还給国民。”

可是，这些議員又通过自己的報告人托克維爾一致声称：国民議会无权建議廢除共和国，这个权力只能属于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議会。此外，他們声称，宪法只能在“合法的”基础上，就是說，只有在按照宪法規定的四分之三的多数票贊成修改时才能修改。經過六天的激烈討論之后，7月19日，宪法修改案果然被否決了。贊成修改的有四百四十六票，反对修改的有二百七十八票。极端的奧爾良派梯也尔、尚加爾涅等人在表决时和共和派及山岳派采取了一致行动。

这样，議会的多數表示反对宪法，而宪法本身却表示拥护議会的少数，拥护必須执行議会少数決議的原則。可是，秩序党在 1850 年 5 月 31 日和 1849 年 6 月 13 日岂不都曾經把議会多數置于宪法之上嗎？它以前的全部政策岂不都是以宪法条文服从議会多數决定为基础的嗎？它不是曾經让民主派以迷信旧約的态度去对待法律的字眼，并因为这种迷信而处罚了民主派嗎？可是目前，修改宪法无非就是要延长总统掌权的期限，而延长宪法的寿命无非就是要罢免波拿巴。議会表示拥护波拿巴，但是宪法表示反对議会。所以，当波拿巴撕毀宪法时，他的行动是合乎議会精神的，而当他解散議会时，他的行动又是合乎宪法精神的。

議会宣布了宪法，同时也就是宣布議会本身的統治是处在“多數之外”；議会以自己的決議廢除了宪法，延长了总统掌权的期限，同时也就是宣布說，当它本身还繼續存在时，宪法既不能死亡，总统的权力也不能生存。它未来的掘墓人已經站在門前了。当議会正忙于討論修改宪法的問題时，波拿巴撤銷了表現得不坚决的巴拉蓋·狄利埃將軍第一师团指揮官的职务，任命馬尼揚將軍继任該职，这位將軍是里昂的胜利者，十二月事变的英雄，波拿巴的爪牙之一，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就由于布倫远征事件因拥护波拿巴而多多少少地出了丑。

秩序党关于修改宪法的决定表明，它既不能統治，又不能服从；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既不能和共和国調和，又不能把共和国推翻；既不能捍卫宪法不受侵犯，又不能廢除宪法；既不能和总统合作，又不能和总统决裂。它究竟是期待誰来解决一切矛盾呢？期待日历，期待事变的进程。它不再控制事变了。这样，它就把自己交给事变支配，交给这样一种力量支配，对于这种力量，它在反对

人民的斗争中已經一步一步地让出了各种权力，直至它自己在这种力量面前变得毫无权力为止。为了使行政权力的首脑能够更順利地定出对付它的战斗計劃，加强自己的进攻手段，选择自己的工具和巩固自己的陣地，秩序党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决定退出舞台，使議会从8月10日到11月4日休会三个月。

不仅議会政党分裂为原来的两大集团，不仅其中的每一个集团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議会內的秩序党和議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資产阶级的演說家和作家，資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一句話，資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資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外省的正統派，由于眼界狭小和过分热情，責备他們的議会領袖貝利耶和法卢投奔波拿巴陣營和背叛了亨利五世。他們的百合花的头脑只相信造孽行为，不相信外交手腕。

商业資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家之間的分裂，更加不可挽救，更具有决定的意义。正統派責备自己的政治家背棄了原則，而商业資产阶级却正好相反，責备自己的政治家忠实行已經變得无用的原則。

前面我已經指出，自从富尔德加入內閣以来，那一部分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握有绝大部分权力的商业資产阶级，即金融貴族，已經变成波拿巴派了。富尔德不仅在交易所中維护波拿巴的利益，而且也在波拿巴面前維护交易所的利益。关于金融貴族的态度，最好是从他們的欧洲机关刊物即倫敦的“經濟学家”⁴²杂志中引一段話來說明。这个杂志在1851年2月1日那一期上发表了如下的巴黎通訊：

“現在各方面都有人声明法国首先要求安宁。总统在他致立法議会的咨文中声明了这一点；国民讲台上也有人响应了这一点；報紙上再三重复說到

这一点；教堂的教坛上也宣扬这一点；国家证券对于最小的危害安宁的事件的敏感以及它們在行政权力每次胜利时的稳定，也证明这一点。”

“经济学家”杂志在 1851 年 11 月 29 日那一期上以自己的名义宣称：

“在欧洲所有的证券交易所中，总统現在已被公认为秩序的卫士。”

可見金融貴族指責秩序党对行政权力进行的議会斗争是破坏秩序，而把总统每次对它那些看来是自己的代表們的胜利当作秩序的胜利来欢呼。这里所說的金融貴族，应当了解为不只是那些巨大的国债經紀人和国家证券投机者，这些人的利益当然是和国家权力的利益相吻合的。全部現代金融业，全部銀行业，都是和国家信貸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有一部分銀行資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兌現的国家有息证券。銀行存款，即交給銀行并由銀行在商人和工业家之間分配的資本，有一部分是从国家債权人的紅利中得来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們來說是摩西和先知，那末現在，当任何洪水都有把旧的国家連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冲去的危險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

狂热地渴望秩序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因議会內的秩序党和行政权力发生爭吵而感到煩恼。梯也尔、昂格勒斯、圣貝夫等人在 1 月 18 日因尙加爾涅退职事件投票以后，也受到选民們（而且正是工业区的选民）的公开譴責，特別是他們跟山岳党成立联盟的行为被指斥为背叛秩序。如果說，像我們所已經看到的，秩序党和总统的斗争不过是些言过其实的嘲弄和瑣屑无聊的攻訐，而这些行为是不配受到好的待遇的，那末，另一方面，对这部分要求自己的代表們順从地把軍权从自己的議会手中奉送給冒險的王位追求者去

掌握的资产阶级，就连那些曾为它的利益而采用过的攻讦手段也不值得采取了。这部分资产阶级表明：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

当波拿巴巡游各地时，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显贵、市政官员、商业法庭的法官等等，到处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极卑屈的态度迎接他，甚至当他在第戎无情地攻击国民议会，特别是攻击秩序党的时候，也是这样欢迎他。

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1851年初还是这样），商业资产阶级狂暴地反对任何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情况不好的时候（从1851年2月底起已成为经常现象了），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是商业停滞的原因，并要求为了活跃商业停止这种斗争。关于修改宪法的讨论恰好发生在这种不好的时期。既然当时问题是关于现存国家制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资产阶级就更有理由要求它的代表们终止这种痛苦的过渡状态，同时又保持现状。这里面没有任何矛盾。它所了解的终止过渡状态，正是延长过渡状态，将最后的解决拖延到遥远的将来。保持现状只能有两种方法：一是延长波拿巴掌权的期限，一是让波拿巴按照宪法退职，选出卡芬雅克来。一部分资产阶级倾向于后一种解决方法，可是他们除了叫他们的代表对这个迫切的问题保持沉默，不去触动以外，就提不出更好的建议。他们以为，如果他们的代表不出来讲话，波拿巴就不会行动了。他们希望有一个为了不使人看见而把头藏起来的鸵鸟的议会。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希望让已经坐在总统位子上的波拿巴留任总统，一切照旧不变。他们感到慷慨的，是他们的议会不愿意公开违背宪法和率直地放弃权力。

在国民議会休会期間，从 8 月 25 日起召开的各省委员会（大資产阶级的地方代議机关），几乎一致表示贊成修改宪法，即反对議会，拥护波拿巴。

資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著作界的代表和自己的報紙所表現的憤怒，比它跟議会代表們的破裂更为明显。只要資产阶级的新聞記者稍微抨击一下波拿巴篡夺权力的欲望，只要报刊企图保护資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不受行政权力侵害，資产阶级法庭就判处數額異常巨大的罰款和不光彩的监禁，这种情况不仅使法国，而且使整个欧洲都感到惊愕。

前面我已經指出，議会內的秩序党由于叫囂需要安宁而陷自身于无所作为的境地，它在反对其他社会阶级的斗争中亲手取消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即議会制度的一切条件，并且宣布資产阶级的政治統治同資产阶级的安全和生存是不相容的，而議会外的資产阶级群众，却对总统奴顏婢膝，舐毀議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从而促使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資产阶级中讲话和写文章的分子，即資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資产阶级的讲坛和報紙，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它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們私人的事情。它毫不含糊地声明說，它渴望擺脫自己的政治統治地位，以便擺脫和这种統治地位相連的麻煩和危險。

这个議会外的資产阶级，甚至对于为它本阶级的統治而进行的單純的議会斗争和文字斗争，也曾表示激憤，并且出卖了这一斗争的領袖人物；但是現在它却敢于在事后責备无产阶级沒有为它这个資产阶级进行流血斗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資产阶级时刻都为最狹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但現在它

却哀叫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牺牲了它这个资产阶级的理想的政治利益。它装得好像是个好心肠的人，被社会主义者引入歧途的无产阶级不了解他，并且在紧要关头抛弃了他。它的这种哀叫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中得到了反响。自然，这里我不是指德国那些小政客和浅学之辈。我指的是“经济学家”杂志一类的东西，这个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即政变前四天还宣布波拿巴是“秩序的卫士”，而梯也尔和贝利耶是“无政府主义者”，在1851年12月27日，在波拿巴驯服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之后，它又大叫大喊，说什么“无知的、没有教养的、愚蠢的无产阶级群众”背叛了“社会中等和上等阶层的才能、知识、纪律、精神影响、智力源泉和道德威望”。其实，愚蠢、无知和卑鄙的一群，正是资产阶级本身。

的确，法国在1851年是遭受了一次小小的商业危机。2月底，输出比1850年减少了一些；3月，商业衰落，工厂相继关闭；4月，各工业省的情况好像和二月事变后一样令人失望；5月，情况还没有好转；6月28日，法兰西银行还是以存款数量大增和贴现数量大减表明了生产的停滞；直到10月中旬，情况才逐渐好转。法国资产阶级把这种商业停滞说成是纯粹由于政治原因，由于议会和行政权力间的斗争，由于临时的治理形式的不稳定，由于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的可怕远景。我并不否认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巴黎和各省的某些工业部门的衰落有影响。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政治局势的影响只是局部的，而且是很微小的。对于这一点的最好的证明，就是商业开始好转正是在10月中旬，恰好是在政治局势恶化、政治的地平线上笼罩着乌云、每分钟都可能从爱丽舍宫打来霹雳的时候。虽然法国的资产者所具有的“才能、知识、洞察力和

智力源泉”越不出他自己的鼻尖，但是他在倫敦工业展览会⁴³整个会期内总能用鼻子触到自己的商业情况不利的原因吧。当法国工厂相继关闭的时候，英国爆发了商业破产。如果說法国在4月和5月两个月达到頂点的是工业恐慌，那末英国在4月和5月两个月間达到頂点的则是商业恐慌。无论是在法国或英国，毛織业和絲織业的情况都很不妙。虽然英国的棉織工厂还在繼續生产，但是它們所获得的利潤已不像1849年和1850年那样大了。不同点只在于法国发生的是工业危机，而英国发生的则是商业危机；法国是工厂相继关闭，而英国则是生产扩大，不过是在不如前几年那样順利的条件下扩大罢了；在法国，情况最糟的是輸出，在英国是輸入。其共同原因（当然不应在法国政治地平綫的范围内去寻找）是显而易見的。1849年和1850年是物质繁荣和过度生产程度最高的年度，这种过度生产的結果直到1851年才显露出来。这年年初，过度生产因工业展览会即将举行而特別加重了。除此以外，还有下面一些特殊情况：起初是1850年和1851年的棉花歉收，然后是人們确信棉花的收成会比預期的好，棉价起初是上漲，后来突然降低，——一句話，就是棉价漲跌不定。生絲产量至少在法国是低于中等产量。最后是毛織业自1848年以来飞速发展，使得羊毛的生产跟不上去，而羊毛的价格比毛織品的价格高得非常不相称。这样，在上述三个世界性工业部門所需的原料方面，就包含有引起商业停滞的三重原因。而且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以外，1851年的表面上的危机，无非是在过度生产与过度投机还未用尽所有力量瘋狂地跑过工业循环的最后阶段并重新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即回到普遍的商业危机去以前，在工业循环中經常和它們相伴而生的一种暂时停頓。在商业史上的这种間隙时期中，英国发生了商业的

破产，而法国却是工业本身陷于停顿，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业已經經受不住英国的竞争而被排挤出所有的市場，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工业是生产奢侈品的工业，它对商业方面的任何停滞都特別敏感。这样—来，法国除了受普遍危机的影响之外，还經受自己本国的商业危机，这种商业危机为世界市場一般情况所决定和制約的程度，比它受法国地方情况决定和制約的程度要大得多。这里不妨把英国資产者的推断拿来和法国資产者的偏見对比一下。利物浦的一家巨大的商行在 1851 年度的商业总结报告中写道：

“很少有哪一年像过去这一年这样辜负起初对它所寄托的希望了。这一年不但沒有大家一致預期的大繁荣，反而成了最近二十五年来最令人沮丧的年头。这自然只是对商业阶级，而不是对工业阶级而言。可是，在这年初，无疑是有足够的根据使我們預期会有相反的情形：商品貯藏很少，資本充足，食品价格低廉，丰收在望；在欧洲大陆有不受任何破坏的和平，在本国又沒有任何政治上或財政上的困难，——的确，看来商业是完全可以展翅高飞的…… 这一不幸的結果究竟应归罪于什么呢？我們以为应归罪于輸入与輸出的貿易額过分龐大。如果我們的商人自己不把自己的活動限制在較狹小的範圍內，那末，除了三年一度的恐慌以外，什么东西也不会使我們保持均衡。”

現在我們想像一下法国資产者在这种商业恐慌中的情形：他那患着商业狂热病的头脑每天都被这样一些东西所折磨、攬扰和震聋了耳朵，这就是关于政变和恢复普选权的种种謠傳、議会和行政权力的斗争、奥尔良派和正統派的攻訐、法国南部共产主义的密謀活动、涅夫勒省和舍尔省臆想的农民起义、各个总统候选人的自吹自擂、報紙上各种大肆宣扬的口号、共和派要以武力保护宪法和普选权的威胁、流亡 *in partibus* [国外]的英雄們預告 1852 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将是世界末日的文告，——这样我們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资产阶级在这种融合、修改、延期、宪法、秘密活动、联合、亡命、篡权和革命等难以形容的喧嚣的混乱中弄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就疯狂地向自己的议会制共和国喊道：“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令人恐怖的终结！”

波拿巴懂得这种喊声。由于债权人急躁难耐的情绪日益增长，他的理解力更加敏锐了，这些债权人觉得，太阳每一落山，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即 1852 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愈益接近了，天上星辰的运动就表示反对他们的地上期票有发现的效力。债权人变成了真正的占星家了。国民议会使波拿巴丧失了靠宪法来延长其掌权期限的希望，茹安维尔亲王的候选人资格已不允许再犹豫动摇了。

如果说有过什么事变在它尚未到来时老早就把自己的影子先投射过来的话，那末这就是波拿巴的政变了。波拿巴早在 1849 年 1 月 29 日，即在他当选刚过一个月的时候，就已向尚加尔涅提出了这种建议。关于政变的政策，他自己的内閣总理奥迪隆·巴罗在 1849 年夏天以隐蔽的方式谈到过，而梯也尔在 1850 年冬天公开地谈到过。1851 年 5 月，培尔西尼曾经再度企图取得尚加尔涅对于政变的赞助，而“国民议会通报”⁴⁴公布了这些谈判。每逢議会发生風波时，波拿巴派的报纸就以政变相威胁；危机愈是接近，它们的声调就愈放肆。在波拿巴每夜和时髦的男女骗子举行的狂宴上，一到午夜，当豪饮使他们暢談起来并激起他们的幻想时，政变总是指定在第二天早晨举行。剑拔出来，酒杯相碰，議員被抛出窗外，皇袍加在波拿巴身上，而一到早晨，幽灵便又消失，吃惊的巴黎从直率的修女和不慎重的武士们的口里才知道它又度过了一次危险。在 9 月和 10 月两个月间，关于 coup d'état [政变] 的謠傳

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影子像彩色的照像底片一样已蒙上了各种色彩。只要翻一翻9月和10月两个月份的欧洲报纸，就可以找到这类情况的报道：“巴黎到处流传着政变的谣言。听说首都今天夜间就要被军队占领，而明天早晨就会有解散国民议会、宣布塞纳省戒严、恢复普选权并向人民呼吁的法令出现。听说波拿巴正在寻找阁员来执行这些非法的法令。”这些报道总是不变地以“延期”一语结束。政变始终是波拿巴的坚定不移的观念。他是抱着这个观念重回法国的。他为这个观念所控制，以致经常流露于言谈之间。他十分软弱，因此经常放棄自己的观念。巴黎人十分习惯于像对待幽灵一样地对待这个政变的影子，以致最后当这个政变有肉有血地出现时，巴黎人还不愿意相信它。可见，政变之所以成功，根本不是由于十二月十日会的头子严守秘密和国民议会惊慌失措。这个政变是不管波拿巴怎样随便泄露秘密，以及在国民议会完全知悉内情的条件下成功的，因为这是先前的事变进程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

10月10日，波拿巴向内阁阁员们宣布他决定恢复普选权；10月16日内阁阁员辞职；10月26日巴黎知道了托利尼内阁组成的消息，同时，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已由莫帕代替，而第一师师长马尼扬已把最可靠的团队调到了首都。11月4日国民议会宣布复会。国民议会除了把它已学过的课程按简单扼要的提纲复习一遍并表明它只是在死后才被埋葬之外，是别无他事可作了。

国民议会在和行政权力斗争时所失去的第一个阵地就是内阁。国民议会不得不以完全承认纯系虚构的托利尼内阁而庄严地承认这个损失。当日罗先生以新内阁名义向常任委员会作自我介绍时，常任委员会报之以嘲笑。这么一个软弱的内阁竟敢来执行

像恢复普选权这样强硬的措施！可是，全部問題正是在于什么事情也不要通过議会去做，一切事情都要和議会背道而馳地做。

国民議会在它复会的当天就接到了波拿巴的咨文，在咨文中他要求恢复普选权和廢除 1850 年 5 月 31 日的法律。当天他的部长們就提出了这种內容的法令。国民議会立即否決了部长們关于必須立即頒布这个法令的建議，而法律本身在 11 月 13 日以三百五十五票对三百四十八票被否決了。这样，議会就再度撕毀了自己的委任狀，又一次证实它已从自由选出的人民代議机关变成了一个阶级的篡权議會，再度承认它自己割斷了連結議会头部和国民身体的肌肉。

如果说行政权力建議恢复普选权是表示从呼吁国民議会轉向呼吁人民，那末立法权力通过議会总務官提出法案就是表示从呼吁人民轉向呼吁军队了。国民議会是想通过这个法案来确立自己直接調动军队的权力，确立自己創建議会軍的权力。国民議会就这样一方面指定军队来充当自己和人民之間、自己和波拿巴之間的仲裁者，承认军队是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它也不得不肯定，它自己早已放棄統率这种力量的要求了。它不是立刻調动军队而是把自己調动军队的权利当成討論的題目，这就暴露了它对于自己的力量的怀疑。它否決了議会总務官提出的法案，于是就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軟弱无力。这个法案因为只得到一百零八票的少数而失敗了：山岳党决定了它的命运。当时山岳党所处的地位就像布利丹的駢子^①一样，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不是要在两袋干草

① 十四世紀法國經院哲学家布利丹在論述意志自由問題时曾讲了一个駢子的故事：一头駢子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草堆之間，无法进行选择，結果只好餓死。——譯者注

之間决定哪一方誘惑力更大，而是要在两頓棒打之間决定哪一方打得更痛。一怕尙加爾涅，二怕波拿巴；老实說，这种处境决不是英雄好汉的处境。

11月18日，有人对秩序党本身提出的市議会选举法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規定市議会选举人在选区内居住的期限不是三年，而是一年。这个修正案被仅仅一票的多数否決了，但是立刻就发现这一票是計算錯了。秩序党由于分裂成各个敌对的派別，早就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的議会多数。这时它表明，議会內根本沒有什么多数可言了。国民議会喪失了通过决定的能力。它的各个构成部分已經沒有任何联結的力量使其相互結合在一起了，它已經斷了气，它已經死了。

最后，在大难临头的前几天內，議会外的資产阶级群众又一次庄严地证实自己已与議会內的資产阶级决裂。梯也尔这个議会英雄特別严重地患了議会迷的不治之症，他在議会死后还协同国务會議想出了一个新的議会阴谋把戏——制定責任法，把總統牢牢地約束在宪法範圍之内。波拿巴在9月15日巴黎的新的集市大厅举行奠基典礼时，簡直像馬贊尼洛那样有力地把那些愛跑市場的太太和卖魚女人迷惑了一番（不錯，一个卖魚女人的实际力量等于十七个城官）；在議会总务官提出法案之后，他曾使他在爱丽舍宮設宴招待的那些尉官們喜出望外，同样，这时，11月25日，他又把聚会在馬戏場想从他手中領取倫敦工业展覽会奖章的工业資产阶级吸引过来了。現在我把“辯論日报”上他的演說中最典型的一段話引录如下：

“这样出乎意料的成績使我有权再說一遍，如果法兰西共和国有可能关心自己的实际利益和改組自己的机构，而不是一再容忍蠱惑者和君主主义幻

想所惹起的騷扰事件的損失，那末法兰西共和国該是多么偉大啊。（看厅里到处响起雷鳴似的暴風雨般的經久不息的掌声）君主主义的幻想妨碍任何进步和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門。結果是没有进步，只有斗争。我們看到，从前热烈拥护国王的权威和特权的人，現在如何以国民公会的精神行动，只求削弱从普选权中产生的权力。（掌声雷动，經久不息）我們看到，从前为吃革命的苦最多、和最怨恨革命的人，現在怎样煽动新的革命，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要束縛国民的意志……“我保证你們将来能得到安宁”等等，等等。（“好！好！”暴風雨般的叫好声）

工业資产阶级就这样卑屈地鼓掌欢迎了12月2日的政变，欢迎了議会的灭亡，欢迎了自己的統治地位的毁灭和波拿巴的独裁。12月4日轰隆的炮击声报答了11月25日轰隆的鼓掌声，而鼓掌鼓得最起勁的薩兰德魯茲先生的房子挨炮彈也最多。

克倫威尔在解散长期議会时独自一人进入了会場，从口袋里拿出表来，为的是不要让議会比他所指定的期限多存在一分钟，接着就以愉快的幽默的嘲笑把每一个議會議員赶出会場。拿破侖虽然比他的原型要小一点，但他毕竟在雾月18日跑到立法議会去向它宣讀了（固然是以断断續續的声調）它的死刑判决书。第二个波拿巴所拥有的行政权无论和克倫威尔或拿破侖所拥有的比起来都完全不同，他不是在世界史册中，而是在十二月十日会的史册中，在刑事法庭的史册中为自己寻找榜样。他从法兰西銀行窃取了二千五百万法郎，用一百万法郎收买了馬尼揚將軍，用十五个法郎加燒酒收买一个士兵，他偷偷地、像夜間的賊一样去跟自己的同謀者相会，命令他們闖入最危險的議會首領們的住宅，把卡芬雅克、拉摩里西尔、勒夫洛、尙加爾涅、沙爾腊斯、梯也尔、巴茲等人从床上拖下来押进监狱，用軍队占領巴黎各重要据点和議会大厦，第二天一早就在首都各处張貼告示，宣告国民議会和国务會議已被解散，

普选权已經恢复，塞納省宣布戒严。稍后，他就在“通报”上登出了一个伪造的文件，說什么在他周圍已聚集了許多議会权威人士，他們已組成一个非常的国务會議。

議会里剩下的人，主要是正統派和奧爾良派，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内开会，在再三高呼“共和国万岁！”的情况下通过決議罢免波拿巴，毫无成效地向站在市政厅門前張望的人群呼吁，直到最后被非洲猎兵押送到多尔塞兵营，然后又裝进囚車从那里送进馬薩、阿姆和文森等地的监狱。秩序党、立法議会和二月革命的結局就是如此。

在作結論之前，我們且把二月革命的历史作个簡括的概述。

I. 第一个时期，从 1848 年 2 月 24 日起到 5 月 4 日止。二月时期。序幕。普遍联欢的喜剧。

II. 第二个时期，共和国成立和立宪国民議会时期。

(1) 从 1848 年 5 月 4 日起到 6 月 25 日止。一切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在六月事变中遭受失败。

(2) 从 1848 年 6 月 25 日起到 12 月 10 日止。純粹的資產阶级共和派专政。起草宪法。宣布巴黎戒严。資產阶级专政因 12 月 10 日波拿巴当选为总统而廢除。

(3) 从 1848 年 12 月 20 日起到 1849 年 5 月 28 日止。立宪議会对波拿巴以及和波拿巴联合起来的秩序党进行斗争。立宪議会灭亡。共和派資產阶级遭受失败。

III. 第三个时期，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議会时期。

(1) 从 1849 年 5 月 28 日起到 6 月 13 日止。小資產阶级同資產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小資產阶级民主派遭受失败。

(2) 从 1849 年 6 月 13 日起到 1850 年 5 月 31 日止。秩序党

实行議会专政。秩序党以廢除普选权而完成自己的統治，但失去議会內閣。

(3)从 1850 年 5 月 31 日起到 1851 年 12 月 2 日止。議会資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

(a)从 1850 年 5 月 31 日起到 1851 年 1 月 12 日止。議会失去軍队总指揮权。

(b)从 1851 年 1 月 12 日起到 4 月 11 日止。議会在企图重新支配行政权力时遭到失敗。秩序党失去独立的議会多数。秩序党和共和派及山岳党联合。

(c)从 1851 年 4 月 11 日起到 10 月 9 日止。企图修改宪法，使两个王朝派合并并延长总统掌权的期限。秩序党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資产阶级議会和資产阶级报刊同資产阶级群众最后决裂。

(d)从 1851 年 10 月 9 日起到 12 月 2 日止。議会和行政权力公开决裂。議会处于垂死状态，它被自己的阶级、軍队以及其余各阶级所抛棄而复灭。議会制度和資产阶级的統治复灭。波拿巴获得胜利。帝制复辟的拙劣可笑的翻版。

七

社会共和国在二月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詞句、作为一个預言出現的。1848年六月事变时，它被窒息于巴黎无产阶级的血泊中，但是在戏剧的下几幕中，它又常常像幽灵似地出現。民主共和国登上了舞台。它在1849年6月13日和它那四散奔逃的小资产者一同消失了，但是它在逃走时却随身散发了自吹自擂的广告。議会制共和国同资产阶级一起占据了全部舞台，尽量扩展，但是1851年12月2日事件在联合起来的保皇党人的“共和国万岁！”的惊慌叫喊声中把它埋葬了。

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統治，結果是把政权送給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沒有让法国从害怕紅色无政府状态的未来災禍中苏醒过来，12月4日，当那些为燒酒所鼓舞的秩序军队根据波拿巴的命令对蒙馬特尔林蔭道上和意大利林蔭道上的凭窗眺望的显貴资产者射击的时候，波拿巴就把这一未来災禍給资产阶级發現了。资产阶级曾把馬刀奉为神，結果是受到馬刀的統治。资产阶级消灭了革命的报刊，結果是它自己的报刊被消灭了。它把人民的集会置于警察監視之下，結果是它自己的沙龙遭到了警察的監視。它解散了民主派的国民自卫軍，結果是它自己的国民自卫軍也被解散了。它实行了戒严，結果是戒严实行起来对付它了。它用軍事委員会代替了陪审法庭，結果是它自己的陪审法庭被軍事委員会所代替。它把国

民学校置于教士的支配之下，結果是教士支配起它自己的学校来了。它不进行审判就流放囚犯，結果是它自己未經审判就被流放了。它以国家权力鎮压社会的任何运动，結果是国家权力鎮压起它自己的社会的任何运动来了。它因偏爱自己的錢袋而反对自己的政治家和作家，結果是它的政治家和作家被排除了，但是它的錢袋也在它的口被封死和笔被折断后被搶劫了。資產阶级曾不倦地像圣阿尔謝尼对基督徒那样向革命叫喊說：“Fuge, tace, quiesce! ——快跑，住嘴，安靜！”，結果是波拿巴也向資產阶级叫喊道：“Fuge, tace, quiesce! ——快跑，住嘴，安靜！”

法国资產阶级早已把拿破侖的《Dans cinquante ans, l'Europe sera républicaine ou cosaque》〔“五十年后，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薩克式的欧洲”〕这个二难推論給解决了。它以《république cosaque》〔“哥薩克式的共和国”〕解决了这个二难推論。无需乎瑟西的魔法就把資產阶级共和国这个杰作变成一个畸形怪物了。这个共和国除了外表的体面之外，什么也沒有丧失。今天的法国^①是在議会制共和国中就具有了現成的形态的。只要刺刀一戳，水泡就破了，怪物就出現在眼前。

为什么巴黎无产阶级在 12 月 2 日后沒有举行起义呢？

当时資產阶级的倾复还只見之于法令，而法令還沒有被执行。无产阶级的任何重大起义立刻又会使資產阶级活跃起来，会使它和軍队協調起来，这样将为工人造成第二个六月的失敗。

12 月 4 日，資產者和小店主唆使无产阶级起来战斗。当天晚上，国民自卫軍的几个联队答应拿着武器穿着軍装到戰場上来。因

^① 指 1851 年政变后的法国。——編者注

为资产者和小店主已经得知波拿巴在12月2日的一个命令中廢除了秘密投票，命令他们在官方的选举名册上把“贊成”或“反对”写在他们的名字旁边。12月4日的抵抗吓坏了波拿巴。夜間他就下令在巴黎各处張貼了广告，宣布恢复秘密投票。资产者和小店主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經达到了。次日早晨留在家里的正是小店主和资产者。

12月1日深夜，波拿巴以突然的袭击使巴黎的无产阶级失掉了它的领袖，失掉了街垒战斗的指挥者。无产阶级成了沒有指挥官的军队，由于1848年六月事变、1849年六月事变和1850年五月事变的记忆犹新，它絲毫也不願意在山岳党的旗帜下作战，所以就听凭自己的先锋队即秘密团体去挽救巴黎的起义的荣誉，这种荣誉已被资产阶级如此恭順地交给士兵們去蹂躏，以致波拿巴后来能够用一个刻薄的理由解除了国民自卫军的武装：他担心无政府主义者濫用它的武器来反对它自己！

«C'est le triomphe complet et définitif du socialisme!» [“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基佐曾这样評論12月2日的政变。但是，如果说議会制共和国的傾复包含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萌芽，那末这一事实的直接的具体結果就是波拿巴对議会的胜利，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力的胜利，不用詞句掩飾的力量对詞句的力量的胜利。在議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成为法律，即将統治阶级的法律提升成为国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权力的面前，国民完全放棄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和立法权力相反，行政权力所表現的是国民受人統治而不是国民自治。这样，法国逃脱整个阶级的专制，好像只是为了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并且是服从于一个沒有任何权威的个人的权

威。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在经历着苦难的考验。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预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它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权力。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站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⁴⁵！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像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土地所有者的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交错的中世纪领主权力的五颜六色的图谱（像一堆货样一样）转化为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的图案，这里盛行的分工和集中就像工厂里的一样。第一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需把专制君主制所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国家管理的新

对象，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个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从社会成员自己行动的范围中划分出来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起，直到法国的铁路、国有财产和国立大学止。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

但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士兵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而这些士兵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来的，并且他还要不断地用腊肠来讨好他们。由此便产生了怯懦的绝望和难以表述的屈辱情感，这种屈辱压住法国的胸膛，不让它自由呼吸。法国觉得自己似乎是被凌辱了。

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

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主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被农民选中的不是服从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而是驱散了资

产阶级議会的那个波拿巴。城市在三年中成功地曲解了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和辜负了农民对恢复帝国的希望。1848年12月10日的选举只是在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中才得到了真实的表現。

小农人数众多，他們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間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們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貧困而更为加强了。他們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沒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沒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沒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經濟条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們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否通过議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来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

力，这种权力保护他們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給他們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現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历史傳統在法国农民中間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侖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們。于是就出現了一个冒充这个人的人，而他冒充为这个人，只是因为他——根据 Code Napoléon [拿破侖法典] 中的一条：«La recherche de la paternité est interdite» [“不許尋究父方”] ——取名为拿破侖。經過了二十年的流浪生活和許多荒唐冒險行徑之后，預言終于實現了，这个人成了法国人的皇帝。侄儿的固定观念实现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一致的。

但是，也許有人会反駁我說：在半个法国不是发生过农民起义嗎？军队不是圍攻过农民嗎？农民不是大批被捕，大批被流放嗎？

从路易十四那时起，法国还没有看到过农民“因蠱惑人心的活動”而遭到这样的迫害。

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們和他們的小块土地并賜給他們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見；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現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現代的万第⁴⁶。

議會制共和国的三年的嚴酷統治，使一部分法国农民摆脱了对于拿破崙的幻想，并使他們（虽然还只是表面上）革命化了；可是，每当他們发动起来的时候，資产阶级就用暴力把他們打回去。在議會制共和国下，法国农民的意識中发生了新思想和傳統的斗争；这一过程是在教師和教士的不断斗争的形式下进行的，結果总是資产阶级压服了教師。农民第一次力图对政府的行动采取独立的态度；这表現在地方长官和行政官之間的不断冲突上，結果总是資产阶级撤换了地方长官。最后，法国各地农民在議會制共和国时期曾起来反对他們自己的产物，即軍队，結果总是資产阶级用宣布戒严和死刑惩罚了他們。这个資产阶级現在却公然叫喊什么群众愚鈍，說这些 *vile multitude* [可鄙的群氓] 愚鈍，仿佛这些群众把它出卖給波拿巴了。它自己曾以暴力加强了农民阶级对帝国的信赖，它曾热心地把构成这种农民信仰的出生地的状态保留下來。当群众墨守成規的时候，資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剛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

在 *coup d'état* [政变]以后发生的各次起义中，一部分法国农民拿起武器抗議他們自己在 1848 年 12 月 10 日的投票表决。1848 年以来的經驗教訓，使他們学聪明了。但是他們已經投身于历史的地獄，历史迫使他們履行諾言，而大多数农民当时还十分糊塗，以致恰恰是在最紅的各省中农村居民公开投波拿巴的票。按照他們的意見，国民議会妨碍了波拿巴的活動。波拿巴只是現在才打破了城市加之于乡村意志的桎梏。有些地方，农民甚至荒唐地幻想在波拿巴身旁建立一个国民公会。

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崙巩固和調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

他們剛得到的法國土地並滿足其強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國農民現在貧困的原因，正是他們的小塊土地、地產的分散，即被拿破崙在法國固定下來的所有制形式。這正是使法國封建農民成為小塊土地的所有主，而使拿破崙成為皇帝的物質條件。只經過兩代就足以產生這樣不可避免的結果：農業日益惡化，農民負債日益增加。“拿破崙的”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紀初期原是保證法國農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條件，在這個世紀却已變成使他們受奴役和貧困化的法律了。而這個法律正是第二個波拿巴必須維護的『*idées napoléoniennes*』（“拿破崙觀念”）中的第一個觀念。如果他和農民一樣，還有一個錯覺，以為農民破產的原因不應在這種小塊土地的所有制中去探求，而應在這種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況的影響中去探求，那末，他的實驗一碰上生產關係，就會像肥皂泡一樣地破滅。

小塊土地所有制的經濟發展根本改變了農民對社會其他階級的關係。在拿破崙統治時期，農村地產的零星分散狀態補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競爭和正在興起的大工業。農民階級是對剛被推翻的土地貴族的普遍抗議。小塊土地所有制在法國土地上扎下的根剝奪了封建制度的一切營養物。小塊土地的界線成為資產階級抵抗其昔日統治者的一切攻擊的自然堡壘。但是在十九世紀內，封建領主已由城市高利貸者所代替；土地上的封建立場已由抵押制所代替；貴族的地產已由資產階級的資本所代替。農民的小塊土地現在只是使資本家從土地上榨取利潤、利息和地租，而讓土地耕作者自己隨便怎樣去掙自己的工資的一個借口。法國土地所負擔的抵押債務每年從法國農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於英國全部公債每年債息的總額。受到資本這樣奴役的小塊土地所有制（而它的發

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了原始人。一千六百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洞穴只有一个窗,有的有两个窗,最好的也只有三个窗。而窗户之于住房,正如五官之于脑袋一样。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来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现在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执行法庭判决、查封财产和强制拍卖的法典。在法国,除了官方计算的四百万(包括儿童等等)乞丐、流浪者、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五百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本地农村里,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一句话,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不可调和地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可是,强有力和不受限制的政府(这是第二个拿破仑应该实现的第二个*«idée napoléonienne»*〔“拿破仑观念”〕)应该用强力来保卫这种“物质的”制度。的确,这种*«ordre matériel»*〔“物质制度”〕正是波拿巴反对造反农民的一切文告中的主要用语。

小块土地除了肩负资本加于它的抵押债务外,还肩负着赋税的重担。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一切关系和个人的齐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的

各个部分发生同等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間的貴族中間階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屬机关的到处入侵。最后，它造成沒有职业的过剩的人口；使他們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們钻营官职，把官职当作一种值得尊敬的施舍，迫使增設官职。拿破侖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場，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連本帶利一并偿还了他强制征收的賦稅。拿破侖的賦稅曾是刺激农民发展副业的手段，而現在賦稅却使这些副业失去最后的資源，失去抵御貧困化的最后的可能性。至于大群富貴豪华的官僚，这更是最适合第二个波拿巴心意的一种*«idée napoléonienne»*了。既然波拿巴不得不創造一个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級，而对这个等級說来，保存他的統治制度又如同飯碗問題一样地迫切，那末，事情又怎能不是这样呢？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最初的財政措施之一就是把曾經被降低的官吏薪俸提高到原来的水平，并添設了領干薪的新官职。

另一个*«idée napoléonienne»*是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統治。可是，如果说剛剛出現的小块土地由于它和社会相協調，由于它处在依賴自然力的地位并且对保护它的最高权力采取順从态度，因而自然是相信宗教的，那末，債台高筑而和社会及政权脱离并且被迫越出自己的有限范围的小块土地自然要变成反宗教的了。蒼天是剛才获得的小块土地的不坏的附加物，何况它还創造着天气；可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蒼天当作小块土地的代替品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嘲弄了。那时，教士就成为地上警察的塗了圣油的警犬——这也是一种*«idée napoléonienne»*。对羅馬的征討下一次将在法国内部进行，不过它的意义和蒙塔郎貝爾先生所想的剛剛相反

罢了。

最后，*«idée napoléonienne»* 登峰造极的一点，就是军队占压倒的优势。军队是小农的 *point d'honneur* [光荣]，因为军队把小农造成保护自己新得的财产免受外敌侵犯的英雄，颂扬他们刚获得的民族统一，掠夺世界并使之革命化。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在想像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私有感的理想形态。可是，现在法国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所要对付的敌人，已不是哥萨克，而是法警和税吏了。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账簿中了。军队本身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军队大部分都是招募来的新兵，都是些替手，正如第二个波拿巴本人只是一个招募来的人物，只是拿破仑的替手一样。现在军队是在执行宪兵职务围捕农民时树立英雄业绩的；所以，如果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的体系中的内在矛盾迫使他到法国境外去用兵，那末军队在干了几桩强盗勾当后就不是获得光荣，而是遭到痛打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切 *«idée napoléonienne»* [“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青春年少的小块土地所抱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来说，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它们只是它临死挣扎时的幻觉，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但是，为了使法国国民大众解脱传统的束缚，为了使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

来⁴⁷。

12月20日和21日大选的谜，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找到解答，这次大选把第二个波拿巴推上西奈山，并不是为了让他去接受法律，而是为了让他去颁布法律。

显然，资产阶级现在除了投票选举波拿巴之外，是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当严正的宗教家在君士坦士宗教会议⁴⁸上诉说教皇生活淫乱并悲叹必须改革风化时，红衣主教比埃尔·德·阿伊向他们大声喝道：“现在只有魔鬼还能拯救天主教会，而你们却要求天使！”法国资产阶级在政变后也同样高声嚷道：现在只有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还能拯救资产阶级社会！只有盗贼还能拯救财产；只有违背誓言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混乱还能拯救秩序！

波拿巴作为一种已经成为独立力量的行政权力，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力量是中等阶级。所以他就自命为中等阶级的代表人物，并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可是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能够有点作为，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为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和著作力量的敌人。可是，既然他保护中等阶级的物质力量，因而也就不免要使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因此必须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但是，原因和结果总不免有某些混淆，因为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断丧失自己的特征。于是就有抹掉界限的新法令出现。同时波拿巴认为自己和资产阶级不同，他自命为农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于是就有一些预先抄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⁴⁹的贤明政治的新法令出

現。但是波拿巴首先觉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因为他本人、他的亲信、他的政府和他的军队都属于这个阶级，而这个阶级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舒服，是从国库中汲取加利福尼亚的彩票利益。于是他就以颁布法令、撇开法令和违反法令来证实他真不愧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

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摸索前进，时而设法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设法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他这个政府在实际行动上表现的犹豫，和他从伯父的法令上盲目抄袭来的那种政府法令的明快果断的作风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对照。

工业和商业，即中等阶级的事业，应该在强有力的政府下像温室中的花卉一样繁荣。于是就让出了无数的铁路承租权。但是波拿巴派的流氓无产阶级是要发财致富的。于是就有预先知悉铁路租让秘密的人在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但是建筑铁路的资本又没有。于是就强令银行以铁路股票作抵押来发放贷款。但是银行应该由波拿巴本人来经营，——因此就应该优待银行。于是银行就免除了公布每周结算的义务，它和政府订立了极占便宜的契约。人民应该有工作。于是就举办公共工程。但是公共工程增加人民的税负。因此必须使食利者的收入由五厘利息改为四厘半利息，以此来减低税额。但是给资产阶级吃苦药丸要加厚糖衣；因此 *en détail* [零买] 酒喝的人民的葡萄酒税增加了一倍，而 *en gros* [大批买] 酒喝的中等阶级的酒税却减低了一半。现有的工人团体被解散了，可是政府又保证将来团体定会获得奇迹。必须帮助农民。于是就建立了加重农民债务并加速财产集中的抵押银行。但是这

些銀行必須利用來从被沒收的奧爾良王室財產中榨取金錢。可是沒有一个資本家同意后面这个在法令中沒有規定的條件，結果土地抵押銀行也就始終只是一紙法令了，如此等等。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階級的家長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個階級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給另一個階級一些什么。正如吉茲公爵在弗倫特黨時期由於曾把自己的一切財產變成他的黨徒欠他的債務而被称为法國最該受感激的人一樣，波拿巴也想做法國最該受感激的人，把法國所有的財產和所有的勞動都變成欠他個人的債務。他想竊取整個法國，以便將它再贈給法國，或者說得更確切些，以便能够用法國錢再來購買法國，因為他作為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就不得不收買應歸他所有的一切。於是所有一切國家機關、參議院、國務會議、立法團、榮譽軍團勳章、士兵獎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鐵路、沒有士兵的國民自衛軍參謀部以及被沒收的奧爾良王室財產，都成了买卖對象。軍隊和政府機器中的每一個位置，都成了收買的手段。然而在這種先把法國攬取過來，然后再把它交給法國自己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東西還是在流通時流到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和會員的腰包里去的利息。莫爾尼先生的情婦伯爵夫人勒·，對沒收奧爾良王室財產一事曾說過這樣一句俏皮話：『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這是鷹的最初的飛翔”）^①，這句俏皮話，對於這只無寧說是烏鵲的鷹的每一次飛翔都可以適用。一個意大利的卡尔特斯派僧人曾對一個夸耀地計算自己還可以受用多年的財產的守財奴說過：『Tu fai conto sopra i beni, bisogna prima far il conto sopra gli anni』（“你總是計算你的財產，但你

^① «vol»一語有兩個意思：“飛翔”和“盜竊”。

最好是先計算一下你的年岁吧”。波拿巴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对自己說这句话。为了不致算錯年月，他們把每分钟都計算进去。钻进宫廷，钻进内閣，钻进行政机关和军队的上层去的是一群連其中最好的一个也来历不明的流氓，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声名狼藉的、貪婪的浪蕩者。他們穿着华丽的衣服，裝出儼如苏路克高官显宦那样可笑的庄严的样子。如果我們注意到，維隆—克勒維爾^①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道德守护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是它的思想家，那末，我們对这个社的上层人物就能有个清楚的概念了。基佐主持内閣的时候，曾在一家地方小报上利用这个格朗尼埃作为攻击王朝反对派的工具，并且通常都給他如下的好評：«C'est le roi des drôles»，“这是丑角之王”。如果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及其朋党拿来跟摄政时期⁵⁰或路易十五統治时期的朝廷相提并論，那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姘妇的政府，但是从来还没有过面首的政府”^②。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并且他作为一个魔术家不得不以日新月異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作拿破仑的替身，換句話說，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經濟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瀆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礼拜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的仪式⁵¹在巴黎布置礼拜拿

① 巴尔扎克在其长篇小說“表妹培蒂”中，把克勒維爾描繪为最淫乱的巴黎庸人，这个克勒維爾是以“立宪主义者报”报社主人維隆博士为模特儿描摹出来的。

② 这是德·日拉丹夫人的話。

破釜皇袍的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东圆柱顶上被推下来。

卡·马克思写于 1851 年 12 月—

1852 年 3 月

1852 年作为“革命”杂志第 1 期

在纽约出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根据 1869 年版本译的，

并与 1852 年和 1885 年版本

校对过

署名：卡尔·马克思

注 釋

1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之一。在这个著作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在分析法国1848—1851年的革命事件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里，马克思首次提出了关于胜利的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的論点。马克思及时地将1851年12月到1852年3月这个时期的事件写成了书。在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过程中，马克思經常同恩格斯交换关于法国事件的意见。除了报刊和官方的資料外，马克思还利用了一些寄自巴黎的个人通訊作为資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本来是准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约·魏德迈在美国筹办的“革命”周刊上以文从的形式发表的，但是这个杂志魏德迈只出了两期（1852年1月），以后就由于經濟困难而停刊了。马克思的文章到的太晚，所以在这两期中沒有来得及发表。根据马克思的建議，魏德迈于1852年5月把这个著作以单行本出版，作为“不定期杂志”“革命”的第1期（也是唯一的一期）。魏德迈将书名改为“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沒有用路易·波拿巴）。由于經濟窘迫，这个第一版的大部分魏德迈都没有能够从印刷厂主那里买回，运到欧洲去的册数不多。在德国或英国（用英文）再版的企图也沒有成功。书的第二版到1869年才出版。在这次出版时，马克思将著作的原文又重新审阅了一遍。在1869年版的序言中，马克思将他对原文的校訂作了如下的說明：“这本书如果加以修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色彩。因此，我只是改正了一些刊誤，并且刪掉了一些現在已經看不懂的暗喻。”1885年由恩格斯編輯出版的第三版，全文与1869年版一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法文譯本最先于1891年1—11月载于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

- 报”；同年该书又在利尔以单行本出版。1894年在日内瓦第一次出版了本书的俄文版。此后这本书曾多次以俄文重版，其中很多次是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负责出版的。这次出版时是根据1869年德文版的原文。——第1页。
- 2 雾月十八日（1799年11月9日）是在法国完成资产阶级反革命过程的一次政变；政变的结果，建立了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专政。——第1页。
- 3 贝德勒姆是伦敦的疯人院。——第3页。
- 4 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经大选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第4页。
- 5 据圣经故事，当被俘的犹太人从埃及逃跑时，其中一些胆怯的人由于道路的艰难和饥饿，开始惋惜他们做奴隶的日子，因为那时他们至少还可以吃饱肚子。于是，“惋惜埃及的肉锅”就成了一句谚语。——第4页。
- 6 *Hic Rhodus, hic salta!*（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转意：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这是对一个说大话的人讲的话，他硬说自己曾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很远（引自伊索寓言中的“说大话的人”）。
-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是上述引文的代用语（*Podos*在希腊文中是一个岛名，也作“玫瑰花”讲），这是黑格尔在“法哲学”一书的序言中使用的。——第5页。
- 7 1852年5月，路易·波拿巴的总统任期届满。根据法国1848年宪法，每四年一次的新总统的选举应该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第5页。
- 8 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第6页。
- 9 在1869年的德文版以及1852年版和1885年版中，都将立法议会的召开日期错写为1849年5月29日。——第7页。
- 10 王朝反对派 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的一个以奥迪隆·巴罗为

首的議員集團。這個集團中代表工商業資產階級自由派情緒的人們，主張實行溫和的選舉改革，認為這是避免革命和保存奧爾良王朝的方法。——第 7 頁。

- 11 克拉普林斯基 是海涅的“兩個騎士”一詩中的主人公，一個破落的貴族；克拉普林斯基這個姓是由法文字 *crapule*（貪食、饕餮、酗酒以及懶漢、敗類的意思）形成的。

馬克思用克拉普林斯基來暗指路易·波拿巴。——第 11 頁。

- 12 “國民報”（*«Le National»*）是 1830 年至 1851 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國日報，是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機關報。——第 12 頁。

- 13 “辯論日報”（*«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國資產階級報紙“政治和文學辯論日報”（*«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簡稱，1789 年創刊於巴黎。七月王朝時期為政府的報紙，奧爾良派資產階級的機關報。1848 年革命時期，該報反映了反革命資產階級，即所謂秩序黨的觀點。——第 12 頁。

- 14 法國 1830 年資產階級革命後所通過的憲章，是七月王朝的根本法。憲章在表面上宣布了國民的自主權並對國王的權力作了某些限制，但是，那些反對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的警察官僚機構和苛刻的法律仍然原封未動。——第 14 頁。

- 15 *«Frère, il faut mourir!»*（“兄弟，要準備犧牲！”）——是特拉普天主教修道會的成員在見面時的互相問候詞。特拉普修道會成立於 1664 年，以嚴格的規章及其成員的禁欲主義生活方式而出名。——第 16 頁。

- 16 克利希 是 1826—1867 年巴黎的債務監獄。——第 17 頁。

- 17 指 1849 年 5—7 月那不勒斯王國參加對羅馬共和國的武裝干涉的事。

1849 年 2 月 9 日在羅馬由全民投票產生的制憲議會，廢除了教皇的世俗權力並宣布成立共和國。羅馬共和國的行政權集中在以馬志尼為首的三執政的手里。在共和國存在的期間，進行了一系列的資產階級民主改革。但是，在土地政策中表現出了共和國的階級局限性；由於

拒絕把地主的土地轉交农民所有，共和国失去了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的同盟者。由于法国、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的武装干涉，罗馬共和国于1849年7月3日被推翻。——第19頁。

- 18 馬克思指的是路易·波拿巴的生平中的以下一些事实：1832年路易·波拿巴曾在土尔高州加入瑞士国籍；1848年在英国的时候，路易·波拿巴曾志願充当特別警察（特別警察是英国的一种由公民組成的警察后备力量），与警察当局一起反对1848年4月10日由宪章派組織的工人示威。——第19頁。
- 19 指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对1848年12月10日选举的分析（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9—51頁）。——第19頁。
- 20 罗馬皇帝卡利古拉（37—41）是由于御用軍的拥戴而即皇位的。——第23頁。
- 21 1849年4月法国政府在援助皮蒙特抗击奥地利和保卫罗馬共和国的借口下，从制宪議会那里得到一笔装备去意大利的远征軍的撥款。而远征的真正目的却是干涉罗馬共和国和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第23頁。
- 22 指1851年11月6日保皇党人勒夫洛、巴茲和帕納及立法議会的議会总务官（議会負責經濟、財政及安全保卫事务的特派員）提出的法案，法案經過激烈的辯論之后，在11月17日被否决。在表决时山岳党人将保皇党人看成是主要危險而支持波拿巴主义者。——第24頁。
- 23 彼得·施萊米尔是夏米索的中篇小說“彼得·施萊米尔奇遇記”中的主人公，他用自己的影子换来一个神奇的钱袋。——第27頁。
- 24 爱姆斯是德国的疗养地。1849年8月正統派曾在这儿召幵會議，法国王位追求者、自封为亨利五世的尚博爾伯爵也参加了这次會議。
克勒蒙特是倫敦附近的一个城堡，路易-菲力浦从法国逃出后住在这里。——第30頁。
- 25 第V条属于1848年法国宪法的序言部分；宪法正文的条文是以阿拉伯

数字編號的。——第 33 頁。

- 26 嘗指路易·波拿巴想从羅馬教皇庇护九世手中接受法國王位的阴谋。据聖經故事，古犹太皇帝大卫是由先知撒母耳主持塗油仪式而登极的。——第 38 頁。
- 27 暗指 1839 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拿破侖观念”(Napoléon-Louis Bonaparte. «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 Paris, 1839)一书。——第 44 頁。
- 28 加入立法議会新选举法起草委員會的十七个奥尔良派和正統派的首領，由于他們貪图权力和抱有反动意图而被称之为城官。这个綽号是从維克多·雨果根据中世紀德国的生活而寫的同名的历史剧中借用的。在德国，城官是被皇帝指派的城和区的統治者。——第 48 頁。
- 29 按照 1850 年 7 月立法議会通过的出版法的規定，報紙出版者应当交付的保证金數額大大增加，并且开始征收印花稅，小冊子也在征收范围之內。这个新的法律是在法国实际上取締出版自由的一些反动措施的繼續。——第 50 頁。
- 30 “新聞報”(«La Presse»)是从 1836 年起在巴黎出版的資產階級日報，在 1848—1849 年，它是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机关报，后来又是波拿巴主义者的机关报。——第 50 頁。
- 31 “通报”(«Moniteur»)是法国日報“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的简称，它是政府的官方机关报，1789 年至 1869 年用这个名称在巴黎出版。——第 53 頁。
- 32 指七月王朝时期路易·波拿巴通过武装叛乱实行政变的企图。1836 年 9 月 30 日他在一些贊成波拿巴主义的軍官的帮助下发动了斯特拉斯堡駐防軍的两个炮兵团，但只經過几小时叛乱分子就被解除了武装。路易·波拿巴本人被捕并被流放到美洲。1840 年 8 月 6 日他利用法国波拿巴主义抬头的机会，和一小撮密謀家一起在布倫登陸，企图在当地駐防軍队中发动叛乱。这个企图也遭到了完全的失敗。路易·波拿巴被判處終身監禁，但他 1846 年就逃往英國去了。——第 54 頁。

- 33 虜克·波頓是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馬克思这里引用的是第一幕第二場的情节。——第 54 頁。
- 34 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是席勒的話剧“强盜”中的人物，是丧失一切道德观念的盗匪和凶手的形象。——第 55 頁。
- 35 指波拿巴派的報紙；这个名称是由路易·波拿巴任總統期間在巴黎的官邸爱丽舍宮而来。——第 57 頁。
- 36 馬克思在这里是用席勒的詩“欢乐頌”中的一行而写的双关語。在这首詩中詩人歌頌了欢乐——来自爱丽舍烏姆或来自爱丽舍园的女儿（在古代作者的笔下爱丽舍园是天堂的同义語）。爱丽舍园也是巴黎街名，路易·波拿巴的官邸就在这里。——第 61 頁。
- 37 議会是十八世紀末資产阶级革命前法国的最高司法机关。許多城市都有議会，作用最大的是巴黎的議会，它办理国王敕令的登記并具有所謂諫疏的权力，即对不合习惯及国家法律的敕令提出反对意見的权力。但議会的反对立場并沒有实际的力量，因为只要国王亲自出席会议，敕令就一定要被登記下来。——第 65 頁。
- 38 貝耳島是比斯开湾的一个島。1849—1857 年是监禁政治犯的地方；参加 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工人也被囚禁在这里。——第 68 頁。
- 39 馬克思在这里运用了古希腊作家阿泰納奧斯（二至三世紀）的著作“學者們之宴会”（«Deipnosophistae»）中的一个情节。他轉述得不完全确切。埃及法老泰俄斯以隱喻的方式譏笑帶兵前来帮助他的斯巴达皇帝阿革西拉烏斯的矮小身材說：“山怀孕了，宙斯很吃惊，但山生了个老鼠”。阿革西拉烏斯回答說：“你把我看作老鼠，但总有一天，你会把我看成獅子的”。——第 70 頁。
- 40 威尼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是正統派的法國王位追求者尙博爾伯爵的駐在地。——第 74 頁。
- 41 指复辟时期正統派陣營中在策略上的意見分歧。路易十八和維萊尔主張比較小心地采取反动的措施，而达尔图尔伯爵（从 1824 年起为国王查理十世）和波林尼雅克却完全忽視法国的局势，主張完全恢复革命前

的秩序。

巴黎的土伊勒里宮是路易十八的皇宮；馬松閣是宮里的建築之一，在復辟時期是达尔圖爾伯爵的官邸。——第 76 頁。

42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是英國經濟、政治方面的周刊，1843 年起在倫敦出版，大工業資產階級的機關刊物。——第 78 頁。

43 倫敦工業展覽會是第一次全世界工商業展覽會，于 1851 年 5—10 月展出。——第 83 頁。

44 “國民議會通報”(《Le Messager de l'Assemblée》)是法國反波拿巴派的日報，于 1851 年 2 月 16 日至 12 月 2 日在巴黎出版。——第 85 頁。

45 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場。——第 95 頁。

46 塞文是法國朗基多克省的一個山區，1702—1705 年整個這個地區爆發了被稱為“卡米扎爾”(“穿襯衫的人”)起義的農民起義。由於對新教徒的迫害而爆發的起義具有鮮明的反封建性質，個別地方一直到 1715 年還有起義爆發。

47 瓦第是法國西部的一個省，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瓦第省曾經發生貴族和僧侶領導的農民反革命暴動。——第 98 頁。

47 在 1852 年的版本中沒有本段最後兩句，作為本段的結束的是：“打碎國家機器絲毫也不會危及中央集權制。官僚政治不過是中央集權制還受其對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贅時的低級和粗糙形態。法國農民一旦對拿破崙帝制復辟感到失望時，就會把對於自己小塊土地的信念拋棄；那時奠立在這種小塊土地上面的全部國家建築物，都將會倒塌下來，於是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得到一種合唱，若沒有這種合唱，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唱是不免要變成孤鴻哀鳴的。”——第 104 頁。

48 君士坦丁宗教會議(1414—1418)是在宗教改革運動開始的情況下為巩固天主教會的已經動搖的地位而召開的。會上譴責了宗教改革運動的首領約翰·威克利夫和楊·胡斯的教理。會議消除了天主教會的分裂狀態，選出了新的教會首腦以代替三個互相爭奪教皇王位的人。——

第 104 頁。

- 49 这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主要在德国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广泛流行的一种反动思潮。“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卡·格律恩、莫·赫斯、海尔曼·克利盖等用仁爱和友情的温情宣传冒充社会主义思想，否认在德国进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反克利盖的通告”、“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 卷第 533—640 頁，第 4 卷第 3—20、223—275、461—504 頁）中批判了这种思想。
——第 104 頁。
- 50 是指 1715—1723 年法国奥尔良王室的菲力浦摄政时期，当时路易十五还处于童年。
——第 107 頁。
- 51 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 是保存在特利尔教堂里的天主教圣物，據說是耶穌在受刑时脱下的圣衣。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是朝圣者的崇拜物。
——第 107 頁。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SS号=10395044